十月评论
October Review

245

2018 年第 2/3 期

第 45 卷第 2/3 期 (總第 245 期) 2018.12.30 每冊港幣 30 元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 沉痛悼念張開老同志

張開: 我的簡要經歷回憶

香港政府涼薄 磨刀捅向長者

中國金融開放即喪權辱國

薩米爾·阿明：一位挑戰掠奪不義的思想家

南非需要用土地改革來處決種族隔離的土地惡魔

歐洲聯盟經濟治理的新階段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沉痛悼念張開老同志

十月評論社仝人

《十月評論》創刊於1974年，至今45載。創始人之一兼主編張開同志，從無休止，筆耕45載，直到2018年9月4日離世之前，仍孜孜不倦編輯、撰文、校對、付印，以99歲高齡羸弱之軀、微薄之物力，撐舉著旗幟使其不倒。一年前，抱病的他留下遺言，期盼《十月評論》繼續辦下去。十月評論社仝人將謹承其志。

張開同志於五四運動爆發翌年出生於廣州中山農民家庭，資質聰穎，好讀書，是大家庭中唯一入讀中學的孩子。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民國動盪時期，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尋求社會主義出路的思潮在青年一代流行，他就讀的小學組織學生遊行，抗議帝國主義侵略，年紀小小的他，搖著紙製的小旗，參加遊行，齊喊“打倒列強、反對軍閥”的口號。初中的校長畢業於暨南大學，老師是就讀北京大學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然後回鄉的年青教師黃靜波。因此，他18歲時，已經在這種薰陶下談論國事、出版壁報、加入“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宣傳抗日、救助日軍炮彈下受傷的民眾。

這是一個不考慮個人利益的大時代，熱血愛國青年比比皆是。張開同志16歲成績優異，考入廣東省最有名的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翌年，因中山淪陷，中學南遷至澳門。儘管戰時艱困，張開同志本可以像同齡人一樣繼續升學，可是，當時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因需要有人接替做出版工作，建議他接手。他覺得義不容辭，毅然輟學，轉到香港，在旺角一間梗房室內，一個人日夜用鉛字排版，印刷抗日傳單、刊物和內部討論文件。同時，他跑去堅道一間左派新聞學院上課，堅持自修學習。20歲正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往後80年，他矢志不移，為選擇了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與他的托派同志的遭遇一樣，用“坎坷”一詞來形容是太輕描淡寫了。但與他的絕大多數的托派同志的遭遇相比，他卻算得上受到幸運之神眷顧，沒有在日帝、國民黨、共產黨、英帝等所有權勢對托派的迫害、誣衊、打壓、殺戮中被摧毀。畢竟，他活了幾近一個世紀，他的一生，彰顯一個無權無勢且受盡政治壓迫的共產主義者，堅守信念，在崢嶸歲月中，活出尊嚴磊落、無私奉獻、無愧無疚的一生。

張開同志個人經歷的肉身和精神痛苦，不足為外人道。22歲時，上海絲綢廠工人罷工，三位女同志被關押，其中一人是知識份子，受不了毆打威嚇，供出同志名字、地址。張開同志因而受牽連被捕，日本憲兵與華人密探對他電擊、灌水、毒打、酷刑迫供，但他拒不供出內情。拘留三個月後獲釋。

30歲時，張開同志第二次被捕。這次是在香港，被港英當局發現，控告印製傳單、作政治宣傳，從事“非法政治活動”，在政治部被英帝幫辦和華籍警察毒打迫供，他堅拒招供，拘禁一個月後被“終身”遞解出境，抵廣州。1951年潛回香港，倖免於1952年冬至日亦即斯大林74歲壽辰翌日，全國一千多

名托派成員和同情者被逮捕的命運，他們不是在獄中死去，便是度過長達三分一世紀的牢獄生涯。

儘管在香港有人身自由，可是張開同志與家人，承受著不可言喻的精神壓力。非法居留，不僅工作、生活上諸多不便，而且隨時有被發現再遞解回大陸的危險，回大陸則意味托派的牢獄之災。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懸頂之劍。只在1995年75歲之時，申獲香港居民身份證之後，才算過上較為安穩的晚年，卻又逐漸疾病纏身了。

儘管如此，張開同志少年立志，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幾十年如一日，從無後悔，從不懈怠。20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後，一直從事研究、文書、宣傳工作。1948年，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召開第三次全國大會，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張開同志被推選為大會秘書長，之後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1950年代，全國大逮捕以後，留居香港的同志組成中國革命共產黨全國臨時委員會，張開同志任書記，到1978年由李西同志接任。他不僅撰寫大量文章，也整理托派文獻，主持出版了244期《十月評論》、11本社會主義研究叢書，也整理協助出版《陳碧蘭回憶錄》、《彭述之回憶錄》、《彭述之選集》4卷，等等。張開同志離世前兩個月，完成了他的自述，既回顧他一生的重要經歷，也描劃了他所接觸的中國托派的歷史、爭論、主張。

他為人謙遜，默默耕耘，不求名不求利，但求出一分力，推進共產主義事業。

張開同志本名劉桂安，曾用的筆名有：劉芒、康君、劉乃光、唯康、流光、向昇、方興、如日、軍行、振言、微波、涓滴……儘管20世紀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重重危機下風起雲湧發生革命，蘇聯、中國的革命卻一一被背叛，但是，張開同志深信，人類只有一個未來，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也深信，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從1920年代至今，儘管被權勢者污衊、中傷、迫害、殘殺，但是，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從陳獨秀、彭述之、陳碧蘭、鄭超麟、王凡西、尹寬、劉家良、籍雲龍，到王振華、黎潔霜、李永爵、羅麗萍、姜君羊、劉平梅、周仁生、高擎宇、樓國華、兆立、鄭澤鏗、謝山、徐可康、王國龍、李西、章華、陳文、吳仲賢以及無數為事業獻身的、在史冊上有名或無名的同志，都以其光明磊落、高風亮節的一生，昭示著高貴的共產主義戰士的靈魂。

托派沉冤昭雪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張開同志，安息!

2018年12月13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5卷第2/3期（總第245期）
2018年12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香港政府涼薄 磨刀捅向長者

則鳴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一系列措施，宣稱“未雨綢繆：應對社會在醫療和安老方面的長遠需要”；“關愛共享：對弱勢社羣多加扶持，與社會大眾共享經濟成果”，並且“秉承會把預計年度盈餘中的接近四成與市民共享，其餘用於改善服務和投資未來。”

香港庫房年年財源廣進，根據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在2017/18年度估計錄得盈餘1380億元。政府收入來源集中，利得稅、薪俸稅、印花稅和地價收入，共佔2017/18年度政府總收入約74%；當中波幅特別大的地價收入和印花稅收入分別是27%和15%。預計來年帳目將錄得466億元的綜合盈餘。2019年3月底，財政儲備預計為11,386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40.3%。

政府坐擁萬億盈餘，離還富於民差遠，僅九牛一毛地推行關愛共享計劃，更叫人齒冷的是磨刀捅向長者，尤其是勞動階級的長者。從2019年2月1日起，申領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事件引起社會猛烈批評。事後政府亡羊補牢，推出1060元「就業支援補助金」，若連同2月起增加至每月2,525元的健全成人綜援，申請津貼者將可獲得共3585元，金額與長者綜援相同。不過有關方案要求60至64歲人士找工作，才符合領取補貼資格。據現時綜援制度，60歲以下、健全的綜援申領人必須參加「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須尋找每月工作時數不少於120小時的有薪工作，然而不同年齡每月必須找工作的次數亦有不同。如果找不到工作，申領人須在每月與社工會面時提供有關證明，才能繼續符合領取全額綜援標準金的資格。以往年近60歲的長者，本應可以轉為申領長者綜援，但隨著政府提高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健全的綜援申領人在60歲至64歲間需要繼續找工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勞動不等於勞損」論，認為勞損是指不適當動作重覆地

產生，不等同勞動人會有勞損；又謂很多有勞動的人，其身體年齡會較缺少勞動的人更年輕。意指從事基層勞動的年長人士，有條件繼續就業、貢獻社會。

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斥其言詞「涼薄」，因長者可選擇工種不多，不少從事保安或清潔，正容易導致身體勞損。根據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2018年2月發表的「香港基層勞工勞損狀況評估報告」，在逾1,511名接受評估並從事基層勞動工作的人士當中，有93.3%接受評估的參加者表示身體最少有一個部分出現勞損情況，超過一半的參加者表示最少有四個身體部分出現勞損情況。

另外，根據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在2017年2月發表的經濟概況報告，在2016年只有不足三成年屆60歲的長者勞動人口從事較高技術階層，例如經理、專業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逾七成長者皆從事較低技術階層，即使撇除當中的「文書支援人員」，仍有逾六成長者屬「非技術工人」、「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工藝及有關人員」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換言之，從事基層勞動工作的長者仍佔大多數。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助理總幹事林文超指，不少長者即便重投勞動市場，都只能找到收垃圾、清潔街道等低技術等工種。捍衛綜援權利大聯盟批評，新政策變相削減長者綜援金，忽視貧窮長者在就業市場面對的剝削與障礙，無法真正協助長者就業及保障其勞動權益。

社會服務聯會、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及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辦事處（三會一方）要求擱置現有方案，認為，「就業支援補助金」每月補回1060元，僅及長者綜援標準金差額，惟現時受影響的60至64歲健全人士，沒法申領長者綜援的「長期個案補助金」及「社區生活補助金」，前者每年2240元，後者每月340元，另外亦不能申領電話費、交通費、眼鏡費等特別津貼。

香港長者權益協會總幹事李立航表示，長者綜援作為本來已存在的社會福利，但時至今日合資格的人士卻不能享有同樣的權利。他認為如果是因為財政問題而作出決定尚算合理，但政府錄得大量財政盈餘，質疑為何依然推行新措施。

社區組織協會批評，在新制度下，60至64歲的長者，由原來領「長者綜援金」變成領「失業綜援金」，現時政府擁有萬億儲備，年年有盈餘，竟削減長者綜援，絕對是涼薄行為，亦是制訂倒退的政策。

總而言之，香港政府帶頭為富不仁，對長者涼薄，踐踏敬老的傳統文化。

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概覽

貧窮人口	137.7萬(100.9萬)
貧窮率	20.1%(14.7%)
長者貧窮率	44.4%(30.5%)
兒童貧窮率	23.1%(17.5%)
一人家庭貧窮線	月入4,000元
四人家庭貧窮線	月入19,900元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最高地區：	北區
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最低地區：	中西區

*（ ）內為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數字

資料來源：《2017年貧窮情況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土地大辯論最終報告：一份假借民意的推銷書(轉載)

吳耀駒

早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下稱小組）向政府遞交土地大辯論的最終報告，建議優先落實18個土地供應選項中的8項，當中包括短、中及長期建議，合共可提供3000公頃土地，遠超政府當初預計2046年所缺乏的1200公頃土地需求。而於8項建議之中，不乏爭議性較大的3個建議：包括以只收回部份粉嶺高球場場用地、以公私營合作發展新界私人農地以及假借民意認同東大嶼都會填海。

粉嶺高球場：權貴繼續有波打，基層繼續捱貴租！

對於整個土地大辯論中呼聲最高的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選項，報告只建議先收回32公頃（約19%）高球場作興建4600住宅單位，而餘下的140公頃高球場土地，則留待政府就檢討私人遊樂場契約時「作通盤考慮」後決定是否收回。小組指先收回部份高球場土地是基於發展土地需要兼顧「體育發展」及「房屋需求」，但粉嶺高球場一直被批評為只供權貴打球的「富豪花園」，園內設施、服務例如果嶺索價動輒數千元，高昂收費及開放時段等問題根本令大眾難以體驗或參與高爾夫球運動，亦有高球教練曾指失去粉嶺場高球「不會對精英運動員造成太大影響」。而於眾多公眾意見書中，不少商界高層更直言高球場乃是供他們談生意的地方，若收回建屋將影響其業務，可見高球場並非如小組所言完全是體育及房屋的對立，而是一小撮富豪霸佔公地，以犧牲普羅大眾居住、安老、醫療等權利，來換取自身利益及享樂之用。

發展土地不單需要處理居住問題，更要顧及遷入居民的需要，提供社區配套以解安老、康樂、幼兒照顧等需求。民間團體所倡議的發展方向並非只為解決居住需求，包括社民連在內的土地公義聯合陣線提出將170公頃高球場用地當中的四分之一用作興建四萬個公共房屋單位，其餘四分之三用地則用作興建院舍、綜合大樓、醫院、學校及交通等公共設施。

粉嶺高球場作為現有土地供應來源之中最為完整及收地時間最短的方案，理應全面收回作整體規劃之用，但如今小組建議收回部份高球場用地，只會令新發展社區的規劃變得零散，社區不僅會因配套不足而衍生各種問題，更會加重附近地區公共設施的負擔，得不償失。

公私合營與東大嶼填海：預設立場假諮詢

而另外一大爭議，莫過於如何發展新界被刻意荒廢多年的農地。小組建議採用公私營合作的機制發展這些私人土地，將審核申請交由獨立機構把關，此方案看似與林鄭於施政報告提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中，以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作審核單位不同，希望以公開、公平及透明的機制釋除公眾對「官商勾結」的疑慮。但實際上仍是同樣迴避了批評公私合營的核心問題：為何有公權力不用？不以《收回土地條例》作尚方寶劍收回新界農地，反而以公私合營方式讓發展商「農地變黃金」？

社民連及其他民間團體於土地大辯論期間一直倡議動用此把尚方寶劍，以農地定額賠償方式強制收回農地自行規劃發展。報告倡議以公私合營方式釋放地產商於新界囤積多年的千頃農地；卻對另一種收地方式《收回土地條例》諸多藉口甚至自相矛盾，一方面說《土》「有其法律上的制約」，暗示條例或會在發展公共房屋以外的其他公共用途時引起爭議；但另一面卻指出政府一直有引用條例作發展私人土地，用途不限於公共房屋，包括興建道路、學校、公園、醫院、福利服務大樓等基建及社區設施。其實小組早對公私合營有預設立場，諮詢開展初期小組主席黃遠輝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已大打開口牌，在毫無民意基礎下主動提出政府有需要設立一個獨立於政府架構以外的機制處理公私合營模式，可見最終報告只不過是為當初預設立場添上假民意罷了！

而此伎倆亦同樣出現在整合有關東大嶼填海公眾意見之中，報告中只列引量化研究中問卷及電話調查分別62%及58%受訪者支持填海的數據，但對於質化研究中6.9萬份意見書有多於九成反對東大嶼填海的結果，報告卻隻字不提。而自林鄭宣布「明日大嶼」計劃以來，民間一直對計劃的填海成本、利益輸送等問題批評不絕，及後更引發萬人上街遊行反對「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種種民意反彈亦在報告中全無蹤影，其目的彰彰明甚，就是要借助報告中的假民意合理化「明日大嶼」計劃，好讓林鄭能以此強推填海大計，配合國策以及迎合中港資本。香港的土地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若然政府運用公權力果斷收回地產商囤積之千頃農地及粉嶺高球場，早已可足夠其所估計的1200公頃土地需求，又何需動用上萬億的公帑來填海造地？所謂土地大辯論，只不過是為合理化林鄭及一眾地產商的掠財大計而設，一份假借民意的推銷書！

香港房屋問題不單是土地供應問題(轉載)

林超英

（本文原為香港電台邀約撰寫的「香港家書」，於2018年3月31日播出，略有修訂和增添了參考資料。）

林力：

香港近來春暖花開，去年春天去西雅圖探訪你，轉眼間又一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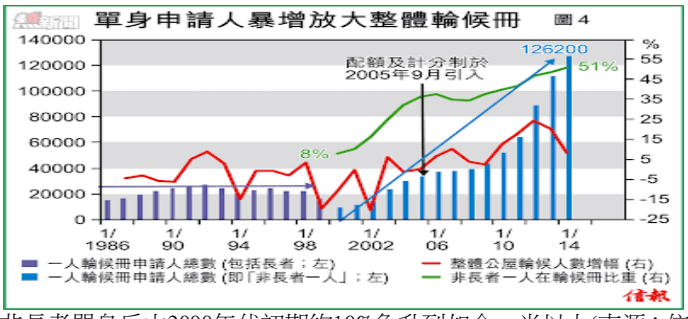
當時我有點意外發現西雅圖樓價跟香港一樣飆升，更沒想到西雅圖市政府處理大量露宿者的計劃是把他們驅趕出城，香港社會相對善心，政府政策是建設低租金的公共房屋，安置貧困人口，只可惜目前申請輪候時間長達4.7年，以致約二十萬人居住在細小不堪的劏房。

住是香港的嚴重問題，行政長官前幾天在扶貧高峰會從貧窮角度談到住屋問題，突出地講「一定只能夠靠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言談間提到環保人士代海發聲和請求眾人為居住環境惡劣的小朋友發聲以作平衡，事後惹來一些議論。

近十多年公屋輪候冊的總戶數由約十萬增至二十多萬(來源：端傳媒)

近十多年公屋輪候冊的總戶數由約十萬增至二十多萬（註2），以致輪候期加長，何解？以前的香港人多勞多得後可以買樓，不一定要住公屋，但是十多年來青年人的工資停滯不前甚或下降（註3），加上樓價飆升，他們不吃不喝三十年也儲蓄不到癲價，買樓無望的年青人惟有加入申請公屋大軍，非長者單身戶由2000年代初期約10%急升到如今一半以上（註4），這是輪候期愈來愈長的真正原因。青年人的做法是被迫和無可奈何的，政府必須找出造成工資低下的基本原因，必須釜底抽薪想辦法提高年青市民的工資，給他們看到未來而不用把公屋看成「救生圈」，但是這個牽涉到香港的經濟型態和結構，屬於國家多次提醒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靠金融和炒賣樓房支撐香港經濟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建立新的高生產力和合理分配利益的社會。簡而言之，公屋輪候期加長追溯到年青人工資過低和樓價飆升，而不是源於土地供應短缺。

至於劏房戶居住環境惡劣，實際上也是香港近二三十年經濟運作模式的後果，外判制度把低下階層的勞動價值貶低，高租金令中小企業壓縮工資支出，基層人士工作辛苦但金錢回報不斷下降，以致貧者愈貧，勞動者可動用的金錢不多，碰上游資推高樓價和租值，勞動階層在雙重壓迫下，無奈退到劏房捱下去，早在1937年，香港政府的房屋委員會早已指出房屋問題源於貧窮問題，八十年後的今天道理依然，行政長官在扶貧高峰會談這個問題十分恰當，不過不談提高勞動回報而只談找地，離開了問題的核心。



非長者單身戶由2000年代初期約10%急升到如今一半以上(來源：信報，見註4)

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可以簡化為拯救劏房兒童、找地建屋、填海造地。當務之急反而是把房地產炒風徹底壓下去，把給人囤積起來的空置住宅單位釋放出來，同時改善年青人的工資水平，而不是過度聚焦在找尋土地、花費巨資填海造地或入侵郊野公園，更何況在已有的陸地上我們有不少板斧創造住宅單位，例如改建空置政府建築、增加新發展區如洪水橋和錦田南的地積比、市區重建時增加地積比、用好棕地、收回高爾夫球場、在道路或鐵路合適地點建上蓋建屋、在蓮塘口岸及連接道路範圍規劃新發展區等等，方案數不勝數。

只要政府下定決心為香港人的安居樂業努力，願意從根本處着力，方法多得很，不用填海造地，房屋問題的解決也指日可待。

林力，不知道西雅圖政府在解決住屋問題上有甚麼作為？有空時請給我介紹情況。

祝好！

老豆

註腳:

註1，根據林本利說法，見：《蘋果日報》，2017年12月8日。

註2，《端傳媒》, 2016年8月10日：「7張圖帶你透視香港公屋」。

註3，《經濟日報》, 2017年8月2日：「大學畢業生月人中位數20年跌5.5%」。

註4，「宇論」，2014年10月10日, http://yulun2012.blogspot.hk/2014/10/20141010.html?m=1

中國金融開放即喪權辱國

破謎

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政府招攬一批海歸人才，比如耶魯、哥倫比亞、劍橋、牛津，這些來自歐美各大名校的高才生基本上完全佔據了財政、金融、外交等諸多領域的重要職位，集體積極引導國民黨政權走“親英美”路線。美國《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曾這樣描述：“在亞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慶國民政府這樣被‘研究美國的學者’滲透得如此徹底的政府……這個政府中所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中國高官都與自己國家的人民嚴重脫節，他們不瞭解自己的國民，甚至都不瞭解腳下的這座古城，因此根本無法幫助我瞭解中國真正的現狀。除了蔣介石以外，這批人無論生活、做夢、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語。”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年之後，全球化智庫（CCG）和中國留學人員回國服務聯盟等單位在“2018中國海外人才交流大會暨第20屆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上聯合發佈“中國改革開放海歸40年40人”榜單。細看入選的名單，基本上都走親歐美路線的精英，歷史仿佛又回到從前，中共政權與前朝國民政府一樣，“被研究美國的學者滲透得如此徹底，所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中國高官都與自己國家的人民嚴重脫節”。

中國財政高官“自覺擔當起中國全方位開放的先遣隊，促進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的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斷推動金融市場更高層次開放，支持國內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研究允許中資機構參與離岸人民幣市場、證券期貨機構開展跨境業務、擴大證券公司結售匯試點等開放措施。其實，這些措施將中國淪落為美元體系的經濟金融殖民地，等於大開門戶引入金融豺狼掠奪人民財富。高官對此毫無警覺性，但民間愛國人士有所警惕。

2019年初，八百余愛國人士聯名提交《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修改意見。信中寫道: “因銀保監會關於修改《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的決定(徵求意見稿)，及剛於(2018年)11月28日結束了徵求意見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定(徵求意見稿)》，都完全沒有體現平等互利——這個最重要國際經貿合作原則，全是我們單方面自棄主權的不對等徹底開放。由此將導致我國金融及經濟主權的徹底淪喪，產生嚴重的金融和經濟災難的巨大風險。”

“如此不顧一切單方面自棄主權的“開放”，不僅會產生可導致經濟崩潰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且會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已被我國金融開放的歷史所證明——金融越是這樣單方面不對等開放，財富流失就越嚴重;不僅流失了可用於投資的資金(從儲蓄≡投資，變為：儲蓄—資本外逃金額≡投資)，其產生的通脹因素(與流失的外匯財富相對應的多出來的人民幣)，既大

增成本，也嚴重抑制需求，從而徹底封殺了我國的社會利潤空間，企業倒閉，失業嚴重，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速度(從原來的百分之十幾，到上海等自貿區金融開放後的百分之六點幾，再到2018年全面徹底開放金融銀行業後全年GDP降至1%)，不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實業外資都扛不住了。”

余雲輝指出，在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美國真正最想佔領的地方不是南海島礁和臺灣，而是代表中國經濟金融統治權的金融高地: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金融機構控制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股市、期市、債市、大宗商品等定價權)，這也是國家經濟統治權的核心組成部分，屬於國家經濟領域的頂層權力。

余雲輝分析，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內容是控制並肢解中國；現階段美國對華的政治攻勢、軍事攻勢和貿易攻勢不過是“球場上的打配合”，其真實目的是奪取對華的金融控制權，即通過控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軍隊的“錢袋子”，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大戰略。美國利用其自身的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組合已經成功肢解了前蘇聯，美國同樣具備充分的綜合實力肢解其它大國。

余雲輝呼籲堅守資本項目管制和人民幣不自由兌換的底線，堅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中國必須牢牢掌控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人民幣匯率政策必須服務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而不是服務於中美關係，乃至華爾街的金融利益。另一方面，他建議把那些為2億多美國人服務的產能轉向為7億多中國農民服務，以解決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再者，把那些用於交換美元紙幣的商品和勞動力轉向用於美化中國農村、美化中國環境、生產健康有機食品，以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他總結，以“為人民服務”取代“為資本增值服務”、以“人的全面發展”取代“資本的全面滲透”，可以找到制定經濟金融政策的正確方向，也可以找到應對中美貿易戰的正確方略。

資料來源:

(1) 任逸飛，<中華民國的精英們為何偏偏治不好國？> 微信公眾號“歷史研習社”。

(2) “中國改革開放海歸40年40人”榜單發佈，致敬改革開放40年留學回國代表人物，鳳凰網財經，2018-12-24。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224/16638185_0.shtml

(3) 余雲輝，<美對華貿易戰的真實目的是奪取對華金融控制權>，烏有之鄉，2018-03-30。

(4) 八百余愛國人士聯名提交《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修改意見，一線生機網，2019-01-06。

豬事不順：非洲豬瘟、土豬告急、養豬陷阱

青岩

2019年，豬年豬事諸多不順。非洲豬瘟肆虐，土豬品種告急，而豬農被套住了。

中國農業農村部公佈，自2018年8月中國首次發現非洲豬瘟以來，截至2018年11月22日，全國有20個省份47個市（區、盟）發生73起家豬疫情、1起野豬疫情，累計撲殺生豬60萬頭。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副主任黃保續指出，2018年之前，中國一直沒有非洲豬瘟。分子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傳入中國的非洲豬瘟病毒屬基因Ⅱ型，與格魯吉亞、俄羅斯、波蘭公佈的毒株全基因組序列同源性為99.95%左右。

當前中國非洲豬瘟疫情防控形勢仍然十分嚴峻。2019年1月2日，農業農村部通報，國內迄今最大一起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雙興鎮的黑龍江亞歐牧業有限公司，疫情暴發已有一個月以上。工商資料顯示，亞歐牧業是明水縣最大規模的生豬養殖企業。該養殖場存欄生豬約73000頭、發病4686頭、死亡3766頭。

屋漏偏逢連夜雨，土豬品種越來越稀少。2016年，農業部發佈《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十三五”規劃》資料顯示，中國“土豬”一共有90個地方品種，其中國家級保護品種42個，省級保護品種32個，其他品種15個。情況最危急的時候，四川當地的成華豬，“只剩下五六十頭”，比大熊貓都稀少。從1980年到2000年，广東大花白豬的母豬數量從1.3萬頭下降至几百頭。金華豬（兩頭烏）的母豬數量從1980年近25萬頭降至2007年的1萬多頭。有的地方豬種，甚至“已找不到公豬”。巴马香豬、江口蘿卜豬、官莊花豬等豬種曾經陷入瀕危狀態。定縣左旭瘟豬、龍游烏豬和窄勒黑豬等已經滅絕。2008年第二次全國畜禽遺傳資源調查顯示，中國特有的88種地方豬種裡，就有85%左右地方豬種的存欄數量急劇下降，其中31個品種處於瀕危狀態和瀕臨滅絕。在這次為期五年的調查中，有橫涇豬等8個地方豬種未發現，項城豬等4個品種已滅絕。

追溯歷史，1990年代，進口豬入侵，與此同時，中國地方豬消亡。在短短十餘年之間，來自英國的大約克夏豬、來自丹麥的長白豬、來自美國的杜洛克豬（簡稱杜長大），以及它們的二元雜交、三元雜交後代，幾乎佔據了中國所有的生豬市場。超短的生長週期、瘦肉率高達65%以上，沒有養殖戶再願意養中國的地方土豬了。“壹號土豬”曾經做了一個調查，1994年之前，中國土豬約占90%市場份額，而在此之後被大型商品豬擠壓，2007年，中國土豬的市場佔有率不超過2%。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陳清明在一次採訪中曾痛心疾首地呼籲道：“同所有物種滅絕一樣，同樣是一場生態災難。”

其實，豬種的滅絕也與養豬規模化相關。養殖者投入和研發更加催長的飼料,不停的刷新商品豬的出欄記錄，最短4個月。生長時間雖然越

來越短，但投入的飼料似乎有增無減。據統計，2017年中國飼料產量達到28465.5萬噸，其中，豬飼料產量為9551萬噸；如果以2017年6.88億頭的生豬出欄量計算，平均每頭豬需合成飼料139公斤。一頭標準的商品豬，出欄體重約110公斤，時間嚴格控制在180天內，這期間會吃掉139公斤合成飼料，數十車的泔水，大量的青飼料。人類在動物的飼料中，添加大量激素、豬血、豬骨，甚至有報導稱添加安眠藥、鎮靜劑等藥物。

人類對自己犯的錯誤十分善忘。人類曾經瘋狂地往牛飼料裡添加動物屍體，終於集中爆發席捲全球的“瘋牛病”，感染的人會在一年內痛苦地死亡，尚無有效藥物治療。人類曾經大量捕吃野生動物，以致2003年爆發“SARS病毒”，近萬人感染，數百人喪生。養殖的雞越來越多，禽流感終於從禽類傳播給了人類，從H1N1到H7N9，而且目前都沒有針對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苗。

張振武和劉志華批評，中國生豬業以規模化為目標導向，是一個很大的誤區，會製造衍生出許多結構性問題，是難以持續發展的。中國傳統生豬生產方式已經得到徹底改造，規模化養豬比例已達到60%，與美國主導的規模化養豬體系模式已經接軌。生豬品種以“大白×長白×杜洛克”洋三元為主，採用“玉米+豆粕+添加劑”飼料配方標準。隨著規模化養豬比例的提高，在飼養品種上對“洋三元”的依賴將會增強，對商品飼料的依賴亦會增強。商品飼料以玉米和豆粕作為主體原料，蛋白質原料高度依賴豆粕。豆粕是以大豆為原料生產出來的，中國大豆70%從美國進口。這樣，中國生豬生產在實現了規模化之後，對進口大豆產生的依賴將更加強烈。當前，為擺脫對美國進口大豆的依賴，正在推行用花生油等替代豆油。如果在養豬業上推行規模化，即使在食用油上實現了替代，還會由於規模化養豬方式被美國豆粕套住無法擺脫，仍需源源不斷地大量進口美國大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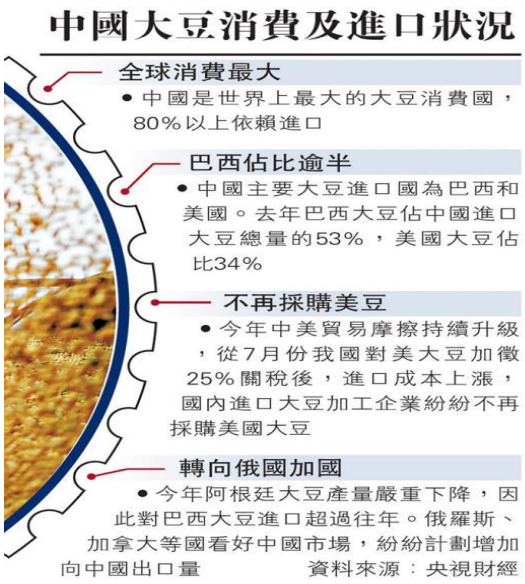
換言之，養豬業實現了規模化之日，就是生豬價格調控權喪失之時。因為，飼料主原料大豆（粕）的定價權由國際期貨市場投機資本炒作來決定。如果飼料主原料的價格控制不了，那麼，生豬飼養成本就無法控制，位於下游的豬肉產品的價格就無法控制。因此，針對國際化風險，必須及時放棄“規模化”導向，儘快擺脫“規模化”陷阱。

張振武和劉志華建議，調整養豬業組織體系，實行“農戶、農合、農協”三位一體的組織結構。在微觀層面，以小型規模化農戶為微觀經營主體。在農戶中推行種養結合迴圈農業生產方式，農戶用農家肥替代部分化肥，減少化肥使用量；在自家土地上種植青、精、粗飼料，減少對玉米、大豆（粕）的依賴。能夠化解國際因素造成的原料價格波動市場風險，降低種糧養畜生產成本。

資料來源:

(1) <洋豬入侵中國30年：正在爆發一場生態災難，種土豬已瀕臨滅絕！>，2018年12月3日，微信公眾號“原鄉味覺”。

(2) 張振武，劉志華，<我國養豬業要調結構更要轉變發展方式>，《養豬》2010，頁2-5。



709案最後審判　立即釋放王全璋律師(轉載)

舉世震驚的「709大抓捕」發生至今已逾3年。「709案」牽連甚廣，上百位行動者及人權律師被捕，多人受到各種滋擾和打壓。其中周世鋒、胡石根及吳淦更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7至8年徒刑。王全璋作為「709案」中最後一位羈押未審的律師，終於在今天迎來這最後的審判。

王全璋1976年出生，自2007年起於北京執業，為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他經常代理敏感案件，如法輪功案、土地維權等，也因而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他曾以「高峰」為筆名在互聯網發表批評時政的文章，及撰寫有關中國公民社會的報告。

王全璋律師於2015年8月3日被警方帶走，並於2016年1月被控「顛覆國家政權」。他長期處於秘密羈押狀態，未能會見家屬所委任的律師，他的妻子李文足在過去3年多亦從未見過他一面。他的辯護律師余文生更於2018年初被捕，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3年多來，關於王全璋僅有的消息只來自官派律師，其準確性也無法核實。

「709案」被捕者家屬包括李文足為了救援她們的親人不斷抗爭，並發展成備受矚目的「709家屬」群體。她們以充滿創意和朝氣的行動，持續挑戰當局的訊息封鎖和白色恐怖，其紅桶行動、千里尋夫、削髮抗議等，均是近年國內民間抗爭的標誌性行動，並成功將中國的人權議題帶到國際平台。但代價是3年來不停的騷擾、監控甚至施暴，連小孩上學也出現問題。

李文足於今年11月獲頒2018年瑞典「愛德爾斯塔姆人權獎」（The Edelstam Prize），以表揚她對捍衛人權所作出的貢獻。德國總理默克爾於今年5月訪華時亦特意拜訪李文足和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豔，反映國際社會對王全璋及「709案」的關注。

今天王全璋案開庭，李文足卻自昨天上午起便被國保看管在家，連自己丈夫的庭審都不被允許參與。對王全璋及「709案」眾人的顛覆國家指控本為子烏虛有，對家屬的監控更是毫無理據。

我們在此要求中國政府：

1.立即無條件釋放王全璋、周世鋒、胡石根、吳淦及余文生；

2.追究「709案」中所有執法人員違法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

3.就王全璋及「709案」受影響人士羈押時所受到的權利侵害提供相應且合適的賠償；

4.停止針對李文足及其兒子的任何形式的打壓；

5.廢除「顛覆國家政權罪」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同時，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公眾和媒體繼續密切關注中國當局對公民社會、人權律師及民間行動者的打壓，合力制止中國愈演愈烈的人權災難。

聯署團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社會民主連線、公民黨、華人民主書院、良心之友

2018年12月26日

2019新年獻詞：前路漫漫，莫失莫忘(轉載)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

如果要給2018找一個關鍵字，你會選擇什麼？我們的選擇是：新生。

2018是新生的一年。在這一年裏，我們與許多同學朋友一起見證了很多第一次。

“請你，接過我的勇氣和力量，為共同的理想奔走呼號；在我不在的日子裏，代我對親友不拋棄，對信仰不放棄；代我忠於勞動人民，永不止息。”

今年年初，因為討論社會現實問題，一位女青年招致被追逃的命運。我們第一次看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困頓，也是第一次看到青年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初心，現實矛盾既然愈演愈烈，青年奔走的腳步只能是越走越快。

“北大精神也很簡單，就是突破社會冷感與原子化處境，為最被壓迫也最有力量的群體積極發聲、認真爭取的精神。這樣的愛，這樣的精神，也絕不應僅僅屬於北大，屬於北大人。”

今年五月四日是北京大學百廿校慶，一位因為號召揭露校園性侵事件的女生，在因為約談風波失去自由過後，重新回到學校寫下這段話。我們第一次看到北大微博陷入癱瘓不是因為掌聲雷鳴，而是因為平日批判太少。

“噩夢中醒來的工人不願意回到暗夜，習慣了站著掙錢就不會再喜歡跪著。從學生到工人，從普通作業員到員工代表，與工人站在一起，我越走越堅定。”

今年夏天日弘廠工人的維權行動當中，一位從中大碩士生到流水線女工的女生，向我們娓娓道來她走到工人當中的經歷。我們第一次看到擺脫精英假面、不懼世俗偏見的青年是具有怎樣的決心和勇氣。這些詞句看起來或許有些“脫節”，或許有些“中二”，但是確實在雞湯與喪的二元選項裏，為我們增添了另一種選擇。

作為北京大學一家學生社團的普通成員，我們在這一年裏，認識到了不少新的朋友，思考到了很多新的話題，收穫到了遠比書本原著多得多的東西——如果摘掉看待特定群體固有的有色眼鏡，我們相信這些故事值得再次細細體會。無論她們過去、現在或者將來，已經或者還將遭到何種程度的污名，都無法掩蓋新時代裏的新青年對新生活的嚮往與渴望。只要我們不願意如鴕鳥一般繼續把頭埋在沙子裏面，我們便能看到這個時代的確是處在激烈的變動當中。

一年以來，國際形勢從未安定太平。中美貿易戰的號角吹響，幾番博弈終不能解除大國利益的根本對立；法國“黃馬甲”的揭竿而起，昭示著底層民眾與上層精英的水火不容；沙特記者的悲劇結局，讓人警醒任何意義上的國家相爭帶來的都是大量的無辜犧牲品。

一年以來，國內新聞屢屢跌破底線。9800個自媒體被強制告別，開足馬力的輿論機器全面侵佔自由的發聲空間；泉港瞞報十倍的碳九洩露，使一座城市籠罩於污濁的空氣中，亦籠罩於傷痛的陰影下；假疫苗壟斷的市場，使多少中產家庭難逃資本的魔爪。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這些消息要遠比新聞聯播裏的資料和冠冕堂皇的說辭來得更為真實。

狄更斯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馬克思說：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是改造世界。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無數青年踏上尋找答案的征途。然而有句老話是這說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不幻想一路花開、一路坦途，走在路上難免要遇見今年冬天一樣的寒冷。

2018年年關將近的時候，學會被校園領導強制改組的消息傳來，令我們倍感詫異，又令許多關注者感到震驚與憤怒——整個改組流程花費時間不到一天，徵集的32名改組發起人無一社團成員，嘗試通過溝通解決問題得不到半點回復，顯而易見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討論現實矛盾已經使得我們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了。

跪下去很舒服，站起來不容易。當我們溫和的抗議被有關部門認為是別有用心，換來暴力拖拽、人身攻擊和理科五號樓內黑暗的18個小時的同時，如果只是討論宋明理學、歌頌太平盛世，則生活如同“黑夜變黎明，寒冬化暖春”般閒適。實際上每一次拐彎、每一次變動都將帶來新的質問，面對這些質問，要麼如同那些新生力量一樣敢於直接回應問題，要麼裝作看不到一切變化回到土裏去。可是我們真的能裝作看不見一年下來茁壯生長的新芽嗎？難道因為道路的曲折就要感到徘徊不前？我們不敢說自己足夠乘風破浪、披荊斬棘，但我們不願意看到理想夭折、前路堵絕。

這一年，我們在奮鬥當中逐漸認識到現實與理想的差距，但愈加堅定。這一年，我們得到了很多同志、同學和老師的支援和幫助，對此我們深表感激。 這一年，我們也收到了許多善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只是因為行路匆匆，來不及深入地反思和改善既有的瑕疵。

馬會改組的事情尚未得到解決，其他流言依舊甚囂塵上。但我們相信新的一年，會有新的氣象。

長路漫漫，莫失莫忘！

願有更多的朋友相會於新年的征途裏！

第四國際第17次會議：分析、行動、建造

列昂・克利繆

在1968年過去五十周年之際， 第十七屆第四國際大會開幕，我們的同志克利文（Krivine）回顧了國際鬥爭與運動的趨向： 越南民族解放陣線（NLF） 對美帝國主義部隊的春節進攻，接踵而來的美國校園反戰起義， 布拉格之春，波蘭， 日本， 意大利， 德國的學生運動， 巴西反對軍事獨裁的運動，法國68年5月運動，最後是墨西哥學生運動以及迪亞茲・奧達斯的軍隊在三文化廣場（the Place of the Three Cultures）的屠殺。

這提醒人們注意這些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注意國際青年的運動， 還有1000萬名法國工人幾個星期的強勢罷工， 以及隨後的意大利、“蹣跚五月（creeping May）”大罷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這個轉折，對成千上萬的活動家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 並且促成了包括第四國際的許多革命組織的建立。這是阿蘭的大會報告精神， 是對未來的開放視野， 在1968年全景中看到的國際趨勢，今天回盪蕩在世界各地，出現在眾多的反擊和鬥爭中。

這種回顧與目前局勢的對比，使得特別明顯的一點是，有需要努力分析世界局勢， 審查社會運動的活動和建立反資本主義組織。

事實上， 討論涉及自2010年上屆大會以來出現的許多問題。會議的氣氛反映了進攻與受挫的程度， 反映了鬥爭和反擊的真正參與程度，也反映了把中堅勢力聚集在一起的不懈努力。

出席會議的人希望在一個活動國際所取獲成果的基礎上來進行思考和建設， 這個國際致力於在所有社會鬥爭的中心建立政治融合。今天， 我們的國際彙集了40個國家的55個親近分支和組織，彙集了1.3萬多名活動家。

本次大會對形勢進行了評估，這個形勢的標誌是阿拉伯區域的革命爆發、拉丁美洲民眾政府的經驗、憤怒運動（Indignad@s ）的爆發、佔領運動和不眠之夜運動（Nuit Debout）、希臘人民對三駕馬車禁令（injunctions of the Troika）的抵制，以及推動婦女權利，反對暴力、強姦和殺害婦女的群眾女權主義運動。但它也表現為川普、普京、埃爾多安、內塔尼亞胡和杜特爾特的權力， 以及歐洲許多政府的反動轉向。所有這些政治因素都是在資本主義體系長期危機的背景下發生的， 這一制度積累了金融、生態、社會和政治危機。

在這一時期， 群眾革命運動並沒有成功地堅決打擊反動攻勢， 特別是過去幾十年，對於在舊工業化國家贏得的社會進步所受到的挑戰，沒有反擊。阿拉伯區域的革命起義已經讓路給反動政府，在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人民的政府沒有兌現其挑戰制度的經濟變革的承諾。資本主義對希臘人民的進攻，成功地使齊普拉斯（sipras）政府扮演了三駕馬車執行者的角色。最後， 在歐洲以及中東和亞洲， 反動的宗教力量已經能夠紮根於大眾階層， 展開對婦女和雙性戀和跨性別戀（LGBT）人士的暴力運動。

代表們表示希望建立我們的國際， 因為過去幾年已經確認需要重新集結起來， 在一個充滿戰爭、暴力、對工人和受壓迫者的攻擊更加沉重的世界中採取行動， 需要增加團結、國際主義的連貫性， 也為了反資本主義革命方向的需要，解決其根本的問題。

分析形勢

首先， 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當前階段和對帝國主義列強、政治混亂及其影響的分析，進行了討論。[1] 分析了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強勢崛起之間的力量平衡， 美國儘管在削弱，但仍然是主要軍事力量， 主要經濟槓杆的操控者， 而中國有其帝國主義政策，表現為在中國海的軍事存在和國際經濟投資的力量。絕大多數代表同意這一論述框架。同時， 干預突出了川普政府政策的內部阻力，突出了婦女動員的力量以及對美國種族主義暴力的反應。其他同志證明， 中國資本在拉美和非洲的侵略性日益增加， 奪取了大片農田的控制權， 危害了傳統的生產和社會結構。亞洲國家同志們的重要與

會， 使我們討論了這一混亂社會局勢的所有層面， 然而， 我們的國際正在發展強大的組織，這個組織很好地建立在大眾階級中， 特別是在巴基斯坦和菲律賓。

在參加本次大會討論的180位積極分子中，鐵定有美國和歐洲的代表。我們北非組織的代表和參加國際主義團結工作的同志們的出席，使得阿拉伯地區的局勢能夠出現在我們的討論中， 儘管沒有中東的代表 --- 除土耳其之外，也沒有南非之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代表，這既反映了進入歐洲的真正困難， 也體現了我們隊伍的弱點。[2]

第二次討論涉及資本主義對環境的破壞和生態社會主義的選擇。[3] 這是處理這個議題的第三次世界大會， 2003年，這個議題已經被置於我們工作的中心。不幸的是， 在過去的15年裡， 局勢只是變得更具災難性。通過的決議強調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責任， 而不是整個人類對環境破壞的責任。人們普遍同意， 要同時反對氣候變化並且消滅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目標要求人們控制自己的命運， 不依賴操作作為市場一部分的綠色資本主義， 而是從公共資源的撥款開始運作，以求滿足他們的社會需要， 同時質疑榨取性（extractivist）政策和無用的巨型專案。討論強調了婦女和農民社團在這些鬥爭中的地位、討論了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作用，以及我們組織並堅定參與了尤其是在菲律賓、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巴西的活動， 還有在加拿大、美國、特別參與了反對克斯通石油管道(Keystone pipeline)計畫的運動 ， 並參與了在歐洲圍繞哥本哈根和巴黎的締約方會議（COPs）的運動， 以及通過在法國的運動抗議聖母瑪利亞朗德機場項目， 或在德國圍繞公民不服從運動"現在就停止開採這裡" (Ende Gelände) 反對褐煤礦的開採。

下一次討論的重點，是對全球範圍內經濟增長和工資變化的分析 --- 論及不穩定就業形式的增加， 以及抵抗運動和民眾衝突的記錄。[4]

捍衛兩項少數決議的同志堅持討論世界級工人階級的數量增長及其在鬥爭中的中心地位。[5]

對大多數人來說，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絕不是工人階級的數字下降。相反，在過去10年中，在生產和服務方面， 特別是在新工業化國家，工資勞動增長了。但是， 這一數字的增長與工人運動的政治削弱有關， 有幾個根本原因: 一是舊工業化國家的傳統改革組織的危機、社會民主主義及斯大林主義組織的危機， 在第一個情形裡，是他們實行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第二個情形則是斯大林制度的垮臺。削弱的另一個因素，顯然來自於近年來所積累的失敗,在歐洲和美洲大陸，社會妥協政策造成正面攻擊，試圖破壞就業及社會保障領域的許多成果。同樣,特別是亞洲 (中國、印度、土耳其等) 新工人階級的發展， 並沒有發生在像二十世紀那樣的背景和權力平衡的情況下。然而， 這種防守態勢並沒有打消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鬥爭意志，例如，在馬格里布（Maghreb）、拉丁美洲、歐洲的社會鬥爭,近年來就表現出了這種戰鬥精神。

討論還強調了幾個長處: 對新工業化國家工人戰鬥性的肯定， 近年來所有運動中年輕人的份量具有決定性， 以及連帶幾代年輕女性活動家的女權運動不僅鼓動了女權鬥爭， 而且還處在所有戰鬥的核心。此外， 幾位代表強調，在工作場所的戰鬥、歧視問題、環境和反對性別暴力的鬥爭之間有很強的聯繫。在農村地區進行的所有鬥爭中， 這些聯繫甚至更強， 往往針對的是跨國公司和軍事干預。此外， 還強調了在工廠和農村地區的自我管理框架內重新啟動生產以及抵抗的經驗。

許多年輕的同志， 特別是婦女， 在這次討論中發言， 證明他們參預了群眾運動，豐富了討論內容， 既談論了意大利或美國的工會鬥爭，又談到了青年的動員， 以及在巴基斯坦圍繞我們的同志巴巴・簡（Baba Jan）的聲援， 後者因參與農民運動反對土地拆遷而受到終身監禁的威脅。最後， 不少政府的獨裁傾向並沒有削弱許多挑戰資本主義剝削壓迫的行動力量。[6]

我們的作用和黨建設的任務

最後一點 --- 關於我們國際及其各支部的作用和任務 --- 是以往的討論和問題的匯合點，基於這些討論已形成另外兩個平臺。[7]

近年來，我們的討論集中在我們各分支在建設更廣泛的政黨方面的經驗，在階級鬥爭和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有益的作用，從最近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這些教訓來自我們在西班牙“我們能夠”黨（Podemos）的同志們，來自巴西的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巴基斯坦的人民工人黨（Awami Workers Party），葡萄牙的左派黨團（Bloco Esquerda），丹麥的紅綠聯盟（the Red and Green Alliance），或者來自希臘左翼聯盟（Syriza）。

討論集中在幾個問題上：侵略性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混亂和國際無序的局面並沒有關閉革命爆發和重大政治危機的大門。今天，全球範圍內的反資本主義者肩負著沉重的責任：建立有助於進行日常抵抗的政治組織，並能夠面對造成力量問題的危機。面臨對兩個明顯少數派立場的批評，會議通過的文件保留了維持這一進程之兩個目的的必要性。抵抗需要製造工具來反對緊縮政策，不管後者來自哪裡。因此，在這次大會上討論的所有情況表明，可能的話，非常有必要建立廣泛和有效的政治團結，並在其中捍衛一個重要的反資本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方向。肯定了在所有情況下都維護第四國際積極分子組織的選擇。

這次大會肯定了團結、反思的工作以及讓我們的組織和國際的領導層年輕化的政治協議。在有些國家裡面，比如最近的巴西和意大利，我們在那裡的支部內部出現分歧，而正是這一年輕化進程的力量，使得國際仍然有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紐帶，從長遠來看，我們能夠使我們的隊伍團聚在一個共同的組織中，就像德國的情況一樣。

第一次應邀參加的幾個新組織，例如巴西的發展、交流和團結運動（MAIS）和巴基斯坦的‘鬥爭’組織（The Struggle），也證明了我們第四國際爭取民主團結的願望。從同樣的觀點來看，在巴西，社會主義左派運動（MES，Movimento Esquerda Socialista ）現在處於傾向第四國際的組織的地位。

最後，大會提供一個機會，重申我們建設國際的選擇，肯定通過定期研討會、發展我們的分析和系統思維，在阿姆斯特丹、馬尼拉和伊斯蘭馬巴德發展我們的教育機構，並倡議歐洲青年的年度聚會。這些努力由於新當選領導人的年輕化而得到了成果。另一方面，儘管許多第四國際的組織在其代表團中尊重男女平等，但在整個大會的與會者中，只有25%的婦女，不過，新的領導層中有40%的婦女。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19, 2018 年 4 月。

註腳

[1] 通過的決議見這裡 ‘資本主義全球化，帝國主義，地緣政治混亂及其影響’。

[2] 在第十七世界大會，來自非洲，美洲（北部和南部），亞洲，澳洲並且歐洲大陸的代表團---作為成員，同情者，常駐觀察員或客人--- 出席了會議，這解釋了為什麼可能有幾個代表團來自同一個國家。這些代表團有：阿爾及利亞、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法屬馬丁尼克-瓜德羅普島)、阿根廷(3個)、澳大利亞、奧地利、孟加拉、巴斯克、比利時、巴西（8個)、英國、中國、克羅埃西亞、丹麥、荷蘭、厄瓜多爾、法國（4個)、德國、希臘語（2個)、伊朗，愛爾蘭，意大利語（2個)，日本（2個)、喀什米爾、摩洛哥、墨西哥（3個)、挪威人、巴基斯坦人（2個)、秘魯(2個)、菲律賓、波蘭、波多黎各、魁北克、儒尤尼昂斯（Reunionese）、斯洛維尼亞、西班牙國、斯里蘭卡（2個)、南非、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美國（3個)，委內瑞拉（2個)。剛果、科西嘉、印度、印尼、黎巴嫩、俄羅斯和瑞士兩個代表團之一以及另一個墨西哥組織不能出席大會。

[3] 見所通過的決議 ‘環境的資本主義破壞和生態社會主義選擇’。

[4]見所通過的決議‘社會動亂、反擊和選擇’。

[5] 革命國際的平臺‘讓我們抓住機遇，建立一個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國際’和 ‘ 革命的新時代和任務’。

[6] 大會聲援羅辛亞人的聲明‘聲援孟加拉羅辛亞難民’。

[7] 見所通過的決議，第四國際的作用和建黨任務。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446 - forum

1938年9月第四國際成立

這一系列文章最初在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的《反資本主義》週刊（*l' Anticapitaliste* ）上作為刊物的中間跨頁發表。[1]

導言

列昂•克熱繆克斯

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一個挑戰：1917年10月後創建的工具共產國際，“清除”了各國黨派，背叛了中國的革命高潮，導致德國反納粹主義的非戰鬥性失敗，已經轉變為斯大林外交的一個分支機構。

重建國際

從1914年8月起，已經有必要抵制社會主義國際領導人向帝國主義政府的屈服。 因此，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在戰爭期間，當時出現了革命的高潮和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有必要重建革命戰士的國際組織。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們並沒有把自己局限於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網羅裡，而是首先嘗試與倫敦局的“中間派”開會，後者拒絕接納斯大林主義，並支持創建第四國際，不過這個嘗試沒有成功。目的是重建一個民眾的國際。 至關重要的是，繼續走1919年共產國際開啟的道路，並在即將到來的戰爭和革命起義中堅定地組織起來。 第四國際終於在1938年成立，希望所聚集起來的少數活動家，可以像在1915年至1919年期間那樣，圍繞國際主義者發展成長。

一个仍然同今天有關的計劃

戰爭結束後，第四國際並沒有將自己變成一個革命的群眾組織，但是建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需要，直到今天仍然迫在眉睫。世界動盪了80年：斯大林主義集團的擴張和崩潰，俄羅斯又回到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和古巴的革命，導致殖民帝國崩潰的獨立戰爭。 所有這些事件，啟動了數千萬男女尋求一條道路，通往不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滿足社會需求的民主社會。 由於戰爭和氣候變化，全球變暖，成千上萬的男女被趕出家園，世界許多地方新的反動勢力的興起，加劇了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日常危害。

1938年革命者所概述的任務仍然在議程上，今天的活動家應該在鬥爭和社會運動中回應他們，並在面對狹隘的沙文主義過激行為時，建立一個革命的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政治革命力量，正面領導女權主義的，生態主義的，反種族主義及反歧視的鬥爭，並擴大曾經激起了第一國際的“共產黨宣言”的雄心。

****

從左翼反對派到第四國際的建立

亞瑟•尼古拉

第四國際的建立，不僅是新結構的出現：它也是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領導的，發生在共產黨和第三國際（IC，他們後來被驅逐出）內的，超過十五年的政治鬥爭進程的結果，那時他們力爭改革於十月革命後成立的國際（IC）。 這場政治鬥爭牽涉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隨者的整個政策，從黨的獨立性到蘇聯的土地政策。

1933年，希特勒獲得政權，而托洛茨基試圖將所有反斯大林主義革命者聚集在一起，這時，左翼反對派的綱領草案，作為五年後將出版的過渡綱領支柱的“十一點”草案出現了。 ‘十一點’草案總結了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者的主要擔憂。毫無疑問，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永遠和無條件的獨立性”。在中國，斯大林通過改變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迫使中國共產黨人解散而進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 由於這個國共合作，1927年4月上海叛亂期間，面對國民政府的鎮壓，共產黨人所能作的，只是解除武裝：儘管發動了總罷工並獲得了中國主要經濟區的政權，共產黨人仍然遭到了他們帶入城裡的蔣介石軍隊的屠殺。

反對“一國社會主義”

反對斯大林主義鬥爭的另一個中心點，是爭取“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及永久性，拒絕‘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事實上，一旦佔領冬宮，整個布爾什維克黨就意識到，有必要將革命擴展到歐洲和整個世界，而斯大林主義則試圖清算革命，揚言有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建

立社會主義”，通過這個陳述來修改所有馬克思主義原則。 顯然，伴隨著這個神話的，是俄羅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說法，這是一種經濟政策所發展的神話，托洛茨基稱其為1923年至1928年的“機會主義”，當時斯大林支持富農（富農）反對工業的發展，然後是1928年至1932年間的“冒險主義”，那時蘇聯轉而反對富農，強行工業化。

雖然這些政治鬥爭最初是在蘇聯共產黨（CPSU）和共產國際（IC）中進行的，但托洛茨基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早在1927年，那位“老人”連帶“左翼反對派”就被排除在蘇共外。但這並沒有阻止反對派成員繼續將自己視為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一部分，他們的目的是改革黨和國際，使後者再次為革命服務。與人們的想法相反，清洗也好，暗殺也好，都沒有將左翼反對派推向一個新的革命國際。任何新國際的建立，都會被認為前一個已被歷史考驗所克服，以致其破產成為無可爭議的。當談到權力的徹底破產時，就意味著需要把它推翻。

第三國際的破產

1933年，由於希特勒的掌權，第三國際破產了：隨著法西斯主義籠罩德國，德國共產黨（KDP）一槍不發就投降了。 這是一場沒有鬥爭的失敗，在斯大林的罪惡眼皮之下，德國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會員被帶到了屠宰場，斯大林的所謂“第三時期”政策稱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阻止任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的發展。

因此，包括蘇聯在內，需要一個新的革命黨。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意味著需要建立新的政黨，其任務是同斯大林主義，一種新形式的反革命改良主義作鬥爭。 然而，在蘇聯，在1930年代唯一的工人國家，雖然任務也是革命，但內容不同，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為十月革命已經破壞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

****

第四國際是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回應

羅仁•里派特

希特勒於1933年1月奪取政權，導致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個新國際的議程，不僅因為第三國際在德國實施的政策已經證明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失敗，而且納粹的勝利，也導致他相信戰爭已是不可避免的。

對於托洛茨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只能導致戰爭，他認為戰爭會比1914年的戰爭更加殘暴，但他也認為，如果無產階級擁有能夠正確引導其領導，就會開啟革命的可能性。 因此，托洛茨基關於國際短期形勢的第一篇論文，是一本關於“戰爭與第四國際”的小冊子，該文於1934年6月以多種語言出版，解釋這場戰爭將引發的新的方向問題。

反對“國防主義”

當然，托洛茨基是遭“國防主義”拒絕的一部分，“國防主義”使得第二國際各分支加入政府的“神聖同盟”，讓它在1914年表現出與資產階級的團結。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聯盟的政策中，托洛茨基再次看到了同樣的邏輯，即民眾陣線的政府在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幫助下實施了這一政策。 對於托洛茨基而言，這一立場，只能導致工人運動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幌子下，與英帝國主義，尤其是法帝國主義的政策保持一致。

在堅決反對“國防”主義政策的同時，托洛茨基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處於布爾什維克政治核心的“革命失敗主義”，不再是適合這種形勢的口號。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週邊國家的崛起表明，不能一刀切地看待所有的民族主義，這導致托洛茨基呼籲支持1935年遭受意大利入侵的衣索比亞，或者1937年遭日本攻擊的中華民國。 同樣的推理，也使他反對那些把西班牙共和政府同弗朗哥主義者（Francoists）放在同一地位上的人：雖然他認為無產階級應該保持階級獨立，拒絕表現出對資產階級的團結，從而進入共和政府，但應該少支持反佛朗哥的鬥爭。

最重要的是，蘇聯問題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對托洛茨基而言，必須向蘇聯提供“無條件支援”，以便無產階級不會失去十月革命的利益。然而，德國政策的破產導致斯大林尋求法英聯盟，這導致第三國際與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集團保持一致。這些因素造成了有些複雜的趨勢，正如托洛茨基回答杜威委員會所說的那樣，當時，杜

威委員會問他，如果蘇聯與法國結盟對抗德國，他會怎麼做，回答是：有必要制定一項阻礙德國戰爭努力的政策，而當時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頗為令人滿意。

在德蘇條約之後

1938年9月3日第四國際成立僅四周之後，這些“方向問題”就變得更加困難，“民主國家”與斯大林決裂，與希特勒簽訂慕尼克協議，把蘇台德地區出賣給希特勒。托洛茨基隨後明白，斯大林的官僚機構將尋求與德國聯盟，對1939年8月德蘇協定的簽訂並不感到驚訝，這個協定破壞了工人運動領導人的穩定。托洛茨基還明白，1940年6月盟軍部隊的崩潰是重新洗牌，強調納粹對歐洲大陸的佔領造成了一種壓迫局面，必然會導致全社會和全國的合法的無產階級抵抗。

因此，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矛盾複雜性，給新國際以及整個工人運動帶來了明顯的方向問題。由於托洛茨基於1940年8月被暗殺，第四國際的處境更加困難，因為戰爭使得各支部無法繼續做反應。雖然它是“本世紀的午夜”，但卻無法適時遞給無產階級提供必要的革命領導，以便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以期符合托洛茨基最初為第四國際提出的目標。

****

第四國際的基礎：過渡方案

邁克爾•羅威

為了準備1938年第四國際創始大會，萊昂•托洛茨基寫了一篇重要文件：“資本主義的死亡痛苦和第四國際的任務”，被稱為“過渡綱領”。

過渡方法

與任何政治文本一樣，它具有與特定歷史時刻相對應的限制。最明顯的是出現在文本中的一個標題：信念是資本主義“正在死亡”，生產力停止增長，資產階級迷失方向，經濟危機無法解決。不過，托洛茨基沒有陷入“樂觀宿命論”的陷阱：他充分意識到資本主義永遠不會自然死亡。未來是不確定的，也不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如果社會主義沒有取得勝利，人類將經歷一場新的，可怕的戰爭，以及威脅人類文明本身的災難。預言式說法... 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把一個決定性角色賦予“主觀因素”，賦予歷史主體的意識和行為：“一切都取決於無產階級”。

該文件的重要處甚至是輝煌的地方，是某一種政治干預方法，即所謂的過渡方法。 這種方法受到十月革命經驗和1920年代和1930年代社會鬥爭的啟發，其出發點是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即認識到：被剝削者的社會覺悟，他們的自我轉型，他們成為歷史主角的能力，首先要歸功於他們自己的實踐，他們自己經歷的鬥爭和社會矛盾。

合理的賭注

托洛茨基打破將改革性的“最低綱領”與抽象的社會主義“最高綱領”分開的舊社會民主傳統，提出了“過渡性”要求，從工人的真實覺悟水準，他們具體而直接的要求開始，導向與資本主義邏輯的對抗，與大資產階級利益作鬥爭。例如：取消“商業秘密” --- 或“銀行保密” --- 以及讓工人控制工廠； 或採取浮動比例的工資和工時作為對失業的回應； 或者徵用大型銀行並把信貸國有化。 再一次，最要緊的是，本檔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辯證方法，即從對制度的直接挑戰進行“過渡”。

儘管20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遭受了可怕的失敗和危機，激勵1938年“過渡計劃”的是一個合理的期盼，即，期盼對資本主義僵局實行革命性解決的可能性，期盼工人通過他們的鬥爭實踐經驗，有能力覺悟他們的根本利益；簡而言之，就是相信被剝削和受壓迫階級能夠拯救人類免受災難和野蠻行為。在21世紀初，這一挑戰並未失去任何意義。

****

創始大會

彭尼樓佩•杜甘

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郊區佩里尼（Périgny）的阿爾弗利德•羅斯默(Alfred Rosmer)農舍舉行了一天的創始大會全體會議 --- 儘管出於安全原因，有人說它已經在洛桑舉行過了一段時間。

自1933年以來，在國際反對派的隊伍中，幾乎一致認為需要一個新的國際。1935年，在托洛茨基的堅持下發表了“第四國際公開信”。但重新組合諸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或倫敦局這類組織的嘗試失敗了，以及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組織本身的困難，阻礙了第四國際在1936

年7月的會議上宣佈成立，還有觀點認為，由於這個新國際缺乏群眾性黨派，這個決定會被誤解。直到1938年的會議才採取了這一步驟。

會議準備了幾個月

對於托洛茨基本人來說，“舉行這次會議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一場毫不妥協的革命運動，它遭受了其他任何政治運動可能未經歷過的迫害，再次顯示出它的力量。”

代表來自11個國家的組織---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蘇聯、意大利、巴西、波蘭、比利時、荷蘭和希臘---宣佈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大會報告列出了來自以下國家的成員組織：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德國、英國、希臘、印度支那、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羅馬尼亞、聖多明哥、南非、西班牙、瑞士、蘇聯、美國、烏拉圭。

此時，特別發生了2月份列昂・瑟多夫（Léon Sedov）--- 托洛茨基的兒子遭暗殺，以及7月份該運動的秘書魯多夫・科勒門特（Rudolf Klement）被暗殺的事件，在這種大規模鎮壓運動的情形下，預備委員會提前準備了幾個月。在會議記錄中談到了魯多夫・科勒門特的死亡，使得他無法向國際秘書處分發其正在準備的報告，他的所有檔在他遭謀殺時消失。

“過渡方案” 的通過

然而，維綸（Vilain，即法國人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在他的介紹性報告中，堅持自1936年會議以來在政治層面取得的實際進展，特別是通過各分部的政治干預而來的進展。他用莫斯科審判，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以及意大利對衣索比亞的入侵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作為里程碑。但是，他強調，在組織層面，由於成員的地域分散，總理事會無法運作，而工作必須由國際秘書處來做。

大會上提出的最重要文件是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見上文）。關於這一文件的討論分為三點：工會問題，特別是圍繞波蘭人提出的佔領工廠的罷工修正案；俄羅斯問題，特別是美國人提出的官僚機構特徵的修正案； 以及戰爭和西班牙的問題。

該草案以21票贊成和1票反對（伊萬・科勒頗，Yvan Craipeau，投的反對票，他於1948年離開國際，在戰爭期間他繼續活躍於地下）通過。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在“第四國際運動”數年之後，劃定第四國際的章程草案以及是否要宣佈辯論，由於科勒門特的死亡而無法準備。但是，討論並通過了一個綱要，從而宣告了“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的成立。波蘭代表不同意這一國際宣言，但確定了他們的服從，並承諾執行這些決定。

除了這兩個文本之外，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階級鬥爭和遠東戰爭的決議”，關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角色”的本文，以及關於不同國家特定情況的一系列決議，包括關於法國分部任務的相當詳細的解決方案。 它還致函萊昂・托洛茨基，並呼籲組織國際團結，特別是與西班牙工人階級的團結。 [2]

會議還就青年問題發表聲明，強調“只有青年的熱情和進攻精神才能確保鬥爭的第一次成功”。它繼續“號召我們所有的青年組織，我們所有的支部，告訴他們：我們只有通過說青年人的語言，表達他們的願望，給他們一個屬於自己的組織，才能為第四國際贏得辛勤工作的青年人。 不是青年政黨。 不是老少年的學院！是青年人參加的激情戰鬥組織：在工廠、軍營、野外，也參與他們的娛樂活動，尋求用潛在而且自發的鬥爭願意激發所有青年人的行為。”[3] 2018年9月11日星期日在巴黎召開了6個國家的青年組織會議。[4]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25, 2018 年 10 月。

註腳

[1]《反資本主義》，<1938年9月：第四國際的建立>, 442卷，2018年9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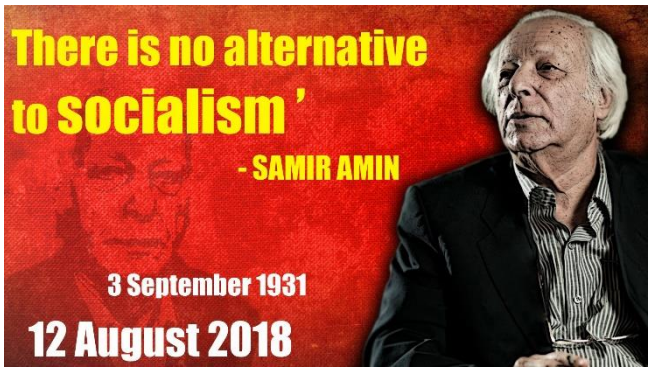
[2]這些本文發表在馬克思主義互聯網檔案館。

[3]這項決議“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和革命青年的組織”並未與其他本文一起在馬克思主義國際檔案館中發表。 這是譯自關於第四國際大會的皮埃爾・弗蘭克叢刊文，第一卷，“1930-40年第四國際的誕生”。

[4]所通過的決議，見“青年決議”。

薩米爾·阿明：一位挑戰掠奪不義的思想家

尼克・迪阿登



薩米爾・阿明（1931-2018）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激進思想家之一，“具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者”，起先是納賽爾埃及的共產主義活動家，後來為諸如朱利斯・尼雷爾等非洲社會主義領導人提供建議，成為世界社會論壇的領軍人物。

薩米爾・阿明的思想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不安的騷動中形成的，當時泛非主義者如誇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統治著迦納和朱利斯・尼雷爾（Juliuys Nyrere）統治著坦尚尼亞，而納賽爾將軍正在轉變中東，涉及範圍從阿明的本土埃及和解放運動茁壯的南非到阿爾及利亞。

在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破壞之前，解放運動方面已取得的進展，而且名為“拯救生命”（LiveAid）的大型搖滾樂演唱會創造了一個關於饑饉無助大陸的大眾觀念，當時的非洲看起來非常不同。然而在這段時間裡，阿明的思想持續發光，譴責當代資本主義和帝國的不人道，同時也嚴厲批評從政治伊斯蘭到歐洲中心論的馬克思主義的運動，批評其把真正受剝削者邊緣化的行為。

全球力量

阿明認為，世界資本主義，是一個以富裕國家為基礎的寡頭壟斷統治，通過五種壟斷 --- 技術控制，自然資源獲取，金融，全球媒體和大規模殺傷性手段 --- 維持其統治。只有推翻這些壟斷，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

這給我們這些北方的活動分子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因為我們所宣導的任何改變，都必須挑戰北方對南方的特權。我們的國際主義不能通過一種對全球南方的人道主義方法來表達 --- 南方國家需要我們“說明發展”。對於阿明來說，任何形式的國際工作都必須以明確的反帝國主義觀點為基礎。任何其他東西都無法挑戰權力結構 --- 那些一心一意要使強大者保持強大的壟斷者。

同安德列・格蘭・弗蘭克這樣的同事一道，阿明認為世界分為“中心”和“邊緣”。我們稱全球南方國家為邊緣國家，其作用是向中心---特別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三合會” --- 提供發展方式，卻不能發展他們自己。最明顯的是，在貿易方面，開採非洲的礦產對中心非常有利，但絕不會讓非洲人獲得解放，只有持續的剝削。

這個看法同如此強的“發展思維”背道而馳，後者會讓你相信非洲的問題來自於沒有適當融入過去40年增長發展的全球經濟。阿明認為，事實上，非洲的問題源于它過於融合，不過是以“錯誤的方式”融合。

事實上，只要壟斷控制完好無損，中心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沒有全球化生產的問題。現在，血汗工廠的勞動出現在所有邊緣國家，但它並沒有挑戰北方國家的力量，由於後者控制著金融，自然資源，軍隊等。事實上，它通過降低工資和摧毀已成為工會工人權力基礎的製造業來增強其權力。

因此，要求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建立更好的貿易關係是沒有意義的。阿明還關注環保活動，

這種活動常常成為關於中心國家如何運用其對世界資源作控制的辯論，而不是挑戰這種控制本身。至關重要的是，北方的活動分子應挑戰們他自己社會中統治階級控制世界其他地方的手段。

去依附

當然，這不僅僅是北方活動家的一個計劃 --- 遠非如此。阿明最著名的理論是所謂的“去依附”。

去依附意味著邊緣國家退出全球經濟中的剝削性一體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去全球化，但它不是一種經濟孤立 --- 一種非洲社會主義領導人很容易陷入其中的孤立。相反，它意味著不捲入於己不利的經濟關係。

阿明認為，南方國家應該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來發展經濟，控制從金融部門進出的資金，促進與其他南方國家的貿易。各國必須將金融部門國有化，強有力地規範自然資源，將內部價格與世界市場“去依附”，並使自己擺脫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控制。無論國有化產業出現什麼問題，它都是使真正社會控制的經濟向前發展的唯一可能基礎。

30年前，他們被告知，通過更多的出口，私有化自然資源和自由化金融部門，他們的問題將解決，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會很願意地聽取阿明的建議。相反，很多國家都相信一個非政治化的說法，這種說法有意識地載入了如“善治”，“貧困”和“公民社會”之類精心偽裝的問題，例如，貧窮是如何發生的，治理服務於哪些利益，或聲稱代表被剝奪者發言的組織的合法性。

阿明不相信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任何方式打破了寡頭壟斷的力量，事實上，那個力量只會變得更加集中。但是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帝國主義強權已經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競爭是無用的，並且創造了一種集體帝國主義，這種集體帝國主義通過像WTO和IMF這樣的機構來表達。

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個短暫”

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長期危機，阿明認為，除了政治野蠻主義，它沒有解決方案。他將這種資本主義形式描述為“衰老的”。

這場危機的特點是對金融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這意味著生產活動產生的資金越來越少，而更多的資金只是來自的“租金”。這是竊取世界大多數地方財富的更直接手段。隨之而來的政治形式意味著民主已經淪為一場鬧劇，在這場鬧劇中，人們是精英劇中的旁觀者 ---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行使其應有的消費者作用。

資本主義必然需要一個持續的剝奪過程，以便它可以積累並繼續擴大。如果沒有歐洲對世界的征服，資本主義就無法發展 ---如此之多的“備用”資源的可用性至關重要。對於失去歐洲土地的許多人，他們的安全期望是允許大規模移民的“新世界” --- 儘管有人成群結隊地死去，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就是見證。

因此，儘管許多無依無靠的人可能渴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但根本不可能。當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必要階段時，他們也不對 --- 這一觀點被阿明描述為“歐洲中心主義”。

工業能包含的，只不過一小部分人類，但它確實需要整個人類所依賴的那些資源。因此，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唯一途徑是創造一個“貧民窟星球” --- 一種“世界級的種族隔離”。阿明認為，對邊緣國家農民的剝奪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核心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阿明把南方農民的角色 --- 幾乎是人類的一半 --- 看作為決定未來的關鍵原因之一。圍繞糧食主權，反對土地掠奪和支持土著人民權利運動的力量支持這一理論。但對於阿明來說，農業不僅僅是一個大好機會，農民的存在也給資本主義帶來了難以克服的挑戰。

阿明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取決於在

國家和地區層面上扭轉這種含有剝奪意義的趨勢，保護當地農業生產，確保各國擁有糧食主權，並將內部價格與世界商品市場去依附。這將阻止剝奪農民的權利，阻止把他們逼入城市。

這場革命，只有在土地被公開處理和獲取的方式下，才能為新社會奠定基礎。這也意味著放棄今天所說的“增長”的觀念，所有世界經濟都按照這個觀念被評判，而實際上它只讓少數世界人口受益。人類的其餘部分“被遺棄到停滯，即便不是貧困”。

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

也許這使得薩米爾・阿明的方法中聽起來相當理想化，但實際遠非如此。阿明明確反對“24小時革命”--- 一個導致社會主義時期產生的單一起義行為 --- 的想法。事實上，他承認，為了使南方經濟多樣化，可能需要使用私人，甚至是國際資本。重要的是控制。出於這個原因，阿明還拒絕使用“21世紀的社會主義”這一短語，側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漫長道路”的需要。

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取得過重大勝利。有趣的是，阿明對拉丁美洲的發展不太感興趣，他認為那種發展有可能重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民族解放運動的錯誤，成為一種“群眾國家主義”。阿明對尼泊爾更感興趣，尼泊爾可能是未來的模式。他還認為，在直接挑戰資本主義基礎和爭取民主社會主義的鬥爭方面，尤其是在“廢除土地私有制”和形成強大的公社和集體方面，中國革命是極其重要的事件。

對於中國革命，阿明的觀點有點浪漫，肯定是對西方痛處的挑戰，但他認為民主的形成必須超越狹隘的政治計劃，農民 --- 尤其是女性 --- 通過集體組織，可能比西方個人主義更好地界定一個真正進步的民主版本，他這個基本觀點需要得到活動分子的適當採納。

啟示

也許阿明的中心論點有點顯而易見，但經常被遺忘的是 --- 真正的革命必須建立在那些被剝奪遭貧困的人身上。但他進一步削弱了這樣的假設，即從南方出現的任何思想都缺乏啟示，或者啟示的缺乏應該被原諒。

他認為，人類邁向民主的第一步是啟蒙運動，將我們從上帝創造我們活動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他完全拒絕政治伊斯蘭，這引起了爭議。這種意識形態，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的理念，模糊了社會的真實本質，包括陷入這樣的想法，即世界由彼此衝突的不同文化群體組成，這一想法有助於中心國家控制邊緣國家。

阿明的觀點是，像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組織，其文化和經濟保守主義，實際上被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政府看好。並且他沒有把批評限制於對伊斯蘭教，他也對印度人民黨實行的政治印度教和達賴喇嘛表達的政治佛教作了類似的批評。

具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者

薩米爾・阿明將自己描述為“具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者” --- “從馬克思開始，而不是以他，或者列寧，或者毛澤東結束” --- 其中包括各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即使是“被過去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教條錯誤地認為是’外來的’東西。“

今天，同阿明開始寫作時相比，這些觀點肯定更有意義。一個具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恰當地考慮到了世界上真正被剝奪者的觀點和願望，打破了歷史教條，拒絕嘗試將破碎的模型粘在一起，但同樣也認為，明天不可能推翻這種模式。

2018年8月13日

本文第一次出版於2011年12月。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23, 2018 年 8 月。

南非需要用土地改革來處決種族隔離的土地惡魔

阿薩・巴哈杜

非洲國民大會有爭議地宣佈， 土地將被無償的徵用， 這引發了關於南非土地改革的爭論。土地是對後種族隔離改革不滿的象徵， 但它是真正土地改革的關鍵， 可以改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大多數黑人迫切需要的收入和生計。

自1994年以來， 南非黑人的土地保有權基本上仍未得到解決， 自從實行民主24年以來，土地歸還和再分配進展不足，還不到2600萬公頃之目標的三分之一。但是， 如果土地改革是為了應對剝奪、就業不足、貧困和不平等的挑戰，那麼，需要集中政治領導和政治意志， 整頓國家對面向窮人的農業發展的支持。

解決南非的過去問題，對土地改革至關重要。即使在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之前， 國家就保障了白人的商業利益， 包括農業用地。1913年的《土地法》只給黑人分配了大約7% 的可耕地。在 1936年， ‘土著信用法’和‘土地法’將給黑人的耕地增加了潛在的13%， 但也把白人和黑人農村地區的隔離正式化了， 並對生活在白人地區的黑人實行了限制。這些法律製造了大量廉價的非洲勞動力， 因為土地的壓力無法維持傳統的農業生計。還施加了進一步的壓力,1950年的「種族區域法」(Group Areas Act)，遏制群眾運動，1951年的班圖人管理機構法（Bantu Authorities Act ） 把黑人推擠入自治的“家園”，自治者是種族隔離政府認可的種族團體。

在南非總理亨德里克・維爾沃德（Hendrik Verwoerd）的政權下，從1958年起，一個稱為 ″分開發展″ 的制度佔據主導地位， 推動了家園故土中的剝奪和貧窮 ， 導致這個情況被蓄意忽視， 加固了這些種族隔離傳統。今天，南非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以前的家園， 這些地方的特點是經濟活動低， 經濟潛力小， 生活貧困的人口眾多。這些地區的土地屬於國家，但受傳統的使用權安排管轄， 以便讓土地為一些家庭使用，後者主要是經營小規模、維持生計的農業，使用的是勞力密集型的傳統生產技術。

相比之下， 前白人農場地區的種族隔離傳統， 創造了由白人資本掌握的商業性大型農業地區。在民主之前的八十年裡， 南非政府通過了立法， 建立了支持白人農民發展的體制能力。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地銀行（The Land Bank of South Africa）向白人農民提供補貼性金融服務和信貸， 而農業信貸委員會（Agricultural Credit Board)， 向沒有資格從土地銀行（Land Bank）借款的白人農民提供信貸。

但是， 隨著民主而來的自由化， 對農民的金融服務受到限制。補貼被削減， 農業信貸委員會（Agricultural Credit Board）根據施特勞斯委員會（Strauss Commission）的建議而關閉了 (1996)。

委員會的建議是， 土地銀行（Land Bank）應得到國庫的贈款， 使其能夠將其發展授權擴大到小農手中， 但這個建議從未實施。土地銀行（Land Bank）本身的放貸也受到限制。農民不得不以較高的利率向商業銀行借錢。這為黑人農民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發展製造了不利的環境， 對小規模經營的黑人農民來說更是如此。

分隔發展的種族隔離政策導致了兩個國家輔助的農業服務體系， 該制度一直存在到1994年。一個體系為白人農民提供了農業方面的廣泛服務， 而另一體系則為處在家園的農民服務。前者由數量相對較少的合格工作人員組成， 通常是大學畢業生， 而後者則由大量不合格的工作人員組成。 在民主之後的十年裡，為白人和黑人農民提供服務的分隔農業輔助體系並沒有合併成功，而服務則惡化了。重要工作人員的空缺，導致農業部“農業擴展幹部恢復計劃（Agricultural Extension Officer Recovery

Plan）”的出現，該計劃由國庫提供資金，目的是將擴展幹部的人數從 2000 人提高到5000人。今天，半官方機構、科學理事會、高等教育和發展機構以及組成南非國家農業研究系統的私營部門之間的聯繫和協調仍然薄弱。

合作社是白人農業成功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1925的《合作社法》（Cooperative Society Act）建立了一個初級生產者合作社網路，它們能夠就低廉價格做談判，並提供糧食儲存和向市場運送農產品這一類的服務。他們還監測品質，調控種植配額，並處理消除盈餘。合作社是重要的金融仲介機構，土地銀行(Land Bank）利用它們作為代理人，以補貼利率向商業農民提供短期和中期信貸。

合作社還是市場銷售委員會的代理商，給他們提供了區域壟斷權來設定商品最低價。國家控制的市場銷售委員會建立了單一管道系統，負責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設定，控制流動，監控品質標準，控制農產品的銷售和出口。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民主轉型期的農產品市場化改革設立了全國農業行銷委員會（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uncil），後者解散了市場控制委員會，並負責管理該部門中的國家干預。

儘管非洲國民大會(ANC)政府考慮重新定位市場行銷委員會，以促進小規模農民的利益，但除了甘蔗工業之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不可行。有人爭辯說，這些董事會將會永久化並增加與農業市場控制有關的許多低效率；對於將福利轉移給窮人的實施，這將是一種非常低效的方式，而且該制度的成本將損害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

種族隔離國家對農業部門的支持是如此的慷慨，以至於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合作社積累了15.2億蘭特的資產 (約合當時的34億美元)，其中八家合作社的資產占這一總數的45%。隨著1994年政治交接的臨近，白人農民開始擔心他們的土地，以及合作社的資產將被徵用。在他們將權力移交給非國大（ANC）之前一年，全國黨（National Party)政府通過了《合作社修正法》(1993年37號)，該法案規定將合作社作為公共或私營的公司。

合作社私有化導致金融資產積累，積累來自國家對私營公司的四十年的補貼。許多合作社的合併，例如2004年，三家前私有化合作農業企業一起擁有超過70% 的國內糧食儲藏設施。一些公司甚至在約翰尼斯堡證券交易所上市，使他們能夠重塑自己的私人農業企業。

南非的農業和農業企業資本，在種族隔離政府的支援下，在向民主過渡的期間，為自己安排新的豁免地位。這是通過一些團體的一連串的 ″密謀″做到的，這些團體更瞭解農業的運作，其目的比非國大（ANC）能夠鼓動的更有連貫性，從而為隨後的市場放鬆管制和自由化奠定了基礎。到種族隔離的結尾期，農業企業，被定義為農業上游的公司活動（種子、化肥、農用化學品、機械）和下游活動（磨面和其他加工、銷售和分銷），高度集中在某些分支和大宗商品上，並且從1994年起，變得越發全面的集中。

1996年，南非有12萬個商業農場，但今天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少於40,000個，原因主要是在一幫商業農民中間進行了導致高資本集中的合併。這也證明，開發可持續的小型商業可行農場的失敗，證明了轉變那種使農村家庭貧窮的糊口生計的失敗。如今，農業佔正規就業率的比例不到8%，而且農業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資和不安全的。

雖然大多數南非黑人仍然依靠土地維持生計，但他們依賴這片土地的生存能力，同種族隔離時期相比，今天面臨的挑戰也同樣艱巨。解決仍然深深地陷於種族界線的土地所有權是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長期致力於發展農業，向農村家庭提供支援服務、信貸和補貼，以解決貧窮、脆弱性和不平等問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和以前的家園。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18, 2018 年 3 月。

分析馬格里布地區的現狀

那地・德巨芒

1. 馬格里布區域---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是由革命的社會運動在不平衡的節奏中走過的。這一革命性動力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先進的例子，顯然是2011年在突尼斯自焚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引發的運動。今天， 這是該地區運動和抗議活動的典範。十年前， 在 2001年，阿爾及利亞經歷了同樣的抗議運動，具有同樣的廣度和更高水準的組織， 但沒有導致政權結構的任何政治變化。該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其範圍被限制在卡比利亞(Kabylie)地區， 其身份認同和文化內涵與該國政治歷史的特殊性有關。然而，社會和民主的層面深刻地構造了運動 (穆罕默德・古爾瑪， 被稱為馬西尼薩[Massinissa]， 死於 2001年4月20日，衝鋒槍打傷後； 他的死亡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叛亂)。

2016年底， 在摩洛哥的胡塞馬（al-hoceima）地區,圍繞著同樣的社會和民主的要求，具有同樣的政治範圍，一個類似的運動出現了， 肇因是一個魚販、繆哈辛・菲克利（Mouhacine Fikri）死在員警手中。這一運動引爆問題上類似於突尼斯的情況而在地區限制上類似於阿爾及利亞的情況， 那裡的巴柏爾人的身份認同傾向於構造運動。

這些運動在時間和節奏上的表達不均， 最終與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三個國家各自的歷史和捲入程度有關。然而，他們在突出社會和政治問題上有一些共同點。

2. 阿爾及利亞社會與資本主義關係比其鄰國更為複雜。歷史上， 在後來成為阿爾及利亞的這塊領土上出現的資本主義， 伴隨著一種類似于文化滅絕的暴力和激進主義。十九世紀初的殖民統治， 被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所稱讚， 包括一些社會主義者， 特別是烏托邦主義者， 塑造了現代的阿爾及利亞， 並對社會及其領土進行了深刻的調整。但這種資本主義的 ″現代化″，遠沒有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沒有建造烏托邦主義者所鍾情的解放， 相反，產生了排斥， 經歷了與當時東方世界的代表,即將過去的奧斯曼帝國的一個決裂。這種排斥的表達，首先是由一個基於身份認同的內在轉向，一個是由於絕望， 拒絕這種 ″現代性″ 。後者與殖民暴力的聯繫， 多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性 ″利益″。隨後，它產生了一種抵抗， 然後是一個激進的與殖民主義的暴力分裂， 同其相關的 ″西方″ 文化決裂，但沒有明確打破其必然結果資本主義。

這段歷史部分解釋了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建構方式。由阿拉伯主義(Baathism， 包括它的敘利亞版本)養育了數十年，伊斯蘭教或柏柏爾人運動（Berberism）最近化身在馬克（MAK） 的卡拜爾自治者中， 這文化疑難，僅部分成功地把身分認同問題放置在政治生活的中心，並沒有完全抹去社會和政治問題。

3. 由一個 ‘柔和的’殖民主義引進，在十九世紀末期以突尼斯和二十世紀初為摩洛哥保護國的形式， 資本主義在整合地方精英 (摩洛哥的Makhzen) 方面，比在新的殖民和資本主義統治的機制中排斥他們做的更多。這一領土和城市的重建是兩國社會轉型的形象。今天，在摩洛哥，在突尼斯少一些，城市和文化遺產的痕跡很明顯，但在阿爾及利亞幾乎完全被抹去。

在馬格里布這些國家， 資本主義和歐洲資產階級文化勝利的條件， 強烈制約了他們隨後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發展， 更傾向於將自己融入對摩洛哥和突尼斯資產階級的依賴性的一個假定關係， 而不是像新生的阿爾及利亞資產階級那樣尋求自治。這也部分地解釋了在摩洛哥傳統上中央集權的等級社會和到集權度少一些的突尼斯， 其底層階級接受的原因，而這在阿爾及利亞遭遇有系統地抗爭，在阿爾及利亞平等主義的精神很好地紮在大眾階層中。阿爾及利亞的這種姿態更多地來自於對法國殖民主義領頭的私有化徵用過程的激烈抵制， 而非依附於標誌著獨立的第一個十年的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4. 這些文化和歷史的方面並不說明一切。在該地區政治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的社會鬥爭的出現， 直接與三國家政府隨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相聯繫。資本主義結構的發展趨同於一個共同點--- 直接的經濟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 (銀行、工業集團、服務業等)，即使阿爾及利亞的資本主義掌握某種自治， 特別是在金融層面，因為它的能源收入來自石油和天然氣。這種依賴性產生對同一類型的工人和環境的一種剝削形式， 一方面工人越來越沒有保障安全， 另一方面掠奪自然資源(碳氫化合物、磷酸鹽或農業產品),不理會直接受世界氣候危機影響的生態和環境均衡。在社會層面， 這種演變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增長。還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願望， 即非正式地將新的撒哈拉以南移民融入經濟， 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們。

在摩洛哥， 這一演變導致了旅遊業、汽車和自由貿易區， 以及像里夫和阿特拉斯這樣的邊緣地區的巨大區域的迅猛 ″發展″。在突尼斯也同樣如此,遭遇了同類型的掠奪性撥款和自然資源的不平等分配， 同類

型的地域發展和領土不勻。在地中海薩赫勒‘一個有用的國家’和西部和南西部後面的國家之間，不平等出現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2011年革命進程從該地區的這一部分開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摩洛哥的動亂開始在里夫。

儘管阿爾及利亞幅員遼闊，但這種社會和領土不平等現象卻略有不同。然而，這並不排除正在進行的相同運動。阿爾及利亞資本主義在獨立後的前三十年所採用的發展主義邏輯，形成於對領土和人口全球一體化的關切。最重要的是，促生了人口的流動，在大城市中心周圍的城市化不斷增長，還有平均規模的城鎮周圍的城市化也在增長。從這個觀點來看，卡比利亞的經常的和重大的暴動不應掩蓋大城市中心同樣眾多的暴動。在阿爾及爾，康斯坦丁，貝賈亞，安納巴或在穆紮泊（Mzab）山谷的瓦爾格拉出現的抗議---後兩個是作為‘南部暴動’而出現的，以 便把他們地區化---都有城市的特點。這些都是‘城市鬥爭’，是城市社會運動的漸進普遍化，是在城市問題的具體矛盾基礎上，對既定秩序提出挑戰的矛盾的社會實踐制度。

但是，就像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這樣的東西一樣，我們可以說，在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背景下，沒有任何發展是一體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這一項目中斷，所奉行的政策尋求摧毀一個生產設施，這個設施肯定是斷斷續續的，但仍然是真實的。從1999年起，由阿卜杜拉齊茲·布特弗利卡政府領導的經濟、工業、能源或農業項目，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和世界市場上尋求‘一致’的一體化。這不僅導致了工業的崩潰，而且造成了整個重建中的領土結構的崩潰，而重建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外國資本的商品和投資的流通（東-西和橫貫--撒哈拉的公路、行動電話、大壩工程、抽取撒哈拉地下水、太陽能和葉岩氣等）。

5. 這一尋求融入世界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必然結果，是這三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統治阿爾及利亞的資產階級官僚機構和摩洛哥的“麥赫贊”（makhzen）(在法國保護下的王室)。如果這種競爭是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旅遊業之間以一種卑鄙的方式進行，後者從前者的削弱中吸取了紅利，那麼阿爾及利亞政權與摩洛哥國王之間的 ″冷和平″ 就不會掩蓋兩個政權希望在該區域和整個非洲以世界帝國主義代理者的角色發揮領導作用。它解釋了高速公路和卡薩布蘭卡-坦吉爾 TGV 的主要項目，也凸現了阿爾及利亞軍隊有能力確保該政權安全，　並以世界強國的名義對其進行監管。

在經濟層面上，阿爾及利亞政權正努力克服其比摩洛哥的 ″落後″情況，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和世界市場的涉入程度著手。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國邊界的關閉是阿爾及利亞政權的幸運之筆。如果這些邊界開放，他們將為在摩洛哥經營的歐洲和美國公司提供一個廉價佔領阿爾及利亞市場的地平線。這將使阿爾及利亞經濟在不平等的競爭面前慢慢自由化。例如,法國汽車公司雷諾，有一個大工廠在坦吉爾，在2012年2月投入生產（到2013年每年產17萬輛汽車，中期達40萬輛，90% 的產品出口）可以受益於正常化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邊境。這將使它能夠從摩洛哥領土---而不是目前情況下的法國或羅馬尼亞---滿足不斷增長的阿爾及利亞汽車需求。這將使對阿爾及利亞這一領域進行投資的任何含糊的願望變得過時。

6. 這種政府間競爭為該地區人民，特別是勞動大眾，奠定了共同的基礎。三個國家的人口未從其各自領土的財富和潛力中受益（除了以真正社會選擇的方式）。這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越來越把各階層人們和整個地區邊緣化，其社會和領土的不平等在不斷加深。如果這一現象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得到意識形態上的承認，它就在阿爾及利亞文化中取得了進展，儘管有阻力，這也解釋了經常發生暴亂的原因。

因此，在這三個國家中，我們目睹了一個多樣化、社會、工會、環境、文化和聯合運動的出現，這構成了反對獨裁政權及其反民主的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環境。通過他們的爭鬥和抵抗，他們給政治要求，社會和民主鬥爭以一貫性。

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這種抵抗仍然缺乏一個社會民主的革命計劃。伊斯蘭教的幽靈在世界極右翼的全球性上升的背景下復興。從文化到政治，“伊斯蘭主義”現在有許多定義。伊斯蘭教支配馬格里布人民的風俗和文化，不是一個新的事實。不幸的是，三個國家的獨立沒有完成文化和民主方面的革命進程，即使它在三個國家中遵循了不同和不平衡的軌道，在突尼斯更 ″世俗化″,摩洛哥世俗化稍次和制度化，而在阿爾及利亞則過渡政治化。政治伊斯蘭的興起鞏固了這種保守主義，並同公共場所和機構的世俗化的必要進步拉開了距離。今天必須回到對這一地區的獨立性的貧乏攫取。

然而，應對各個運動進行分析，確認伊斯蘭的真實動機，並超越對其表述的簡單正式解讀。今天，在人民的眼中，區域退化是高於一切的危險，可能從外面導致 ″伊斯蘭國化″。它寧可加強內部團結在政權周圍，儘管他們各自的國王和總統有疾病和年齡的問題，但現在並沒有顯示精疲力盡的大徵兆。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06, 2017 年 3 月。

歐洲聯盟經濟治理的新階段？

丹尼爾・阿爾巴拉欣

歐洲聯盟在經歷了幾次嚴重的經濟、地緣政治和體制動盪， 其後續影響尚未結束， 經過一段時間的封閉和癱瘓之後， 可能正在進入修改其經濟管理模式的新階段。從這些體制的財政能力來看，至少，在某些未知因素的解決之後，歐盟的體制癱瘓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解除， 這些未知因素，可能與軟性的脫歐有關，與可預見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政府的形成有關。

“極端中心”政府 （塔利克・阿里(Tariq Ali） 的說法)的形成，以其新的組織或聯盟，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和社會自由黨派的政治取向的共同核心，這些黨派支撐著過去三十年的歐洲政權， 在經濟危機暫時緩解的情況下， “極端中心”政府可能導致對現有經濟和體制結構的修改。除了經濟治理的其他因素，這可以重新調整歐洲聯盟的資源，在要求結構調整措施的能力方面，採取更一致的政策，而今天，與會員國可獲得的資金相比， 調整是微不足道的， 對於任何重大財政政策來說，這都是荒謬的， 例如，相對來說， 它遠遠低於已經是適度的美國的公共預算。為了加強財政紀律政策， 應採取措施促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足夠的 --- 金融體系的穩定， 以緩解未來的銀行危機。舊的結構和社會投資計劃將被重定向，受到危機嚴重打擊的各國， 只要它們遵守了經濟、預算和支出結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就可能出現有限的反週期行動。

歐洲精英們曾在制度層面上，就結構性和經濟動力薄弱的原因進行了辯論，伴隨著歐盟項目的一些現存政治討論。雖然新自由主義議程以不同的方式將危機歸咎於預算的無紀律和弱競爭力國家結構改革的缺乏， 但還有一些人將問題歸咎於投資危機、金融過度膨脹或不平等。不管是診斷還是透視， 他們都從一個事實開始，即新的金融危機可能會使歐元區陷入不穩定狀態， 銀行業危機可能引發新的更深的衰退。那些贊成目前的歐元體系結構的人， 無論是極端中心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者（Ordoliberals）， 都主動努力鞏固它， 使歐盟不會分崩離析， 繼續為金融寡頭和歐洲跨國公司服務。

體制性疏通和極端中心政府

這些建議仍然缺乏精確性， 但已經有了解決方案的基礎， 可以提供體制的覆蓋面。已經做出的東西，更接近于一項有具體期限的提案，用18個月的時間， 在領導歐盟專案的政府中達成一些共識， 這些專案是新立的或是不久就要形成的。

法國有一個總統， 伊曼紐爾・馬克龍，比其他人更善於展現極端中心項目， 該項目力爭對歐盟做聯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修改。與此同時，德國可能已經拋棄了牙買加體系（Jamaica）政府的設想，為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社會民主黨（SPD） 一起重新組成大聯盟的可能開闢了道路。自民黨（FDP）反對任何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之類的建議， 如果政府裡沒有自民黨（FDP）的參與，他們這條道路，即使是其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版本， 也會被清除。[1]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歐洲委員會能感覺到對發起歐共體的體制和財政結構改革的支援。在過去兩年中，一種辯論再度興起，這一辯論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討論的基礎，是五位總統關於歐盟財政前景的報告、以及要求進一步深化經濟和貨幣聯盟的關於歐盟未來的白皮書， 或者是歐洲議會也討論過的歐元區的預算能力問題。

關於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精英辯論

關於歐元區財政或預算能力的辯論，已經在歐洲各機構中進行了一段時間， 方法各異， 但並不妨礙它們有許多共同的媒介。馬克龍專案表達了其中一個方面， 不同於默克爾的德國專案。前者的聯邦制-技術官僚-新自由主義的一面， 以及後者較為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的選擇， 選擇金融穩定 --- 一種掩飾優先保護金融體系的委婉說法---給歐洲預算提供財政工具，欲使其有更大的能力。

聯邦主義-技術官僚的變體和被提議擔任聯邦議院主席的舒伯爾（Schauble）所體現的實質

性區別是， 新自由主義的聯邦主義計劃建立諸如歐洲存款基金的補償機制或歐盟範圍的失業救濟金制度， 或者根據競爭力的邏輯,有一個借款的餘地， 以及有關促進投資的工具。歐洲人民黨（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強烈反對直接債務和歐洲失業保險， 像中歐政府那樣，對存款基金持有嚴重疑慮。[2] 舒伯爾（Schauble）離開德國政府，可能有助於解除這個阻礙， 即使最後他的政治路線基本被肯定了。失業保險在提案中沒有獲得考慮， 不過，存款基金有獲考慮。但是,在同意治理或支援基民盟（CDU）的情況下，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不迫使後者同德國向歐洲機構提出的建議連接起來，那麼歐洲存款基金也可能面臨危險。

基民盟（CDU）會同意一個有助於在單一貨幣環境下實現財政穩定的手段， 而不訴諸內部轉讓， 因為在建制派看來， 那將意味著某種重新分配， 對它們而言,按照中歐的刻板印象,這將減少法紀鬆弛的國家道德上的危險。

這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 (EMF) 具有很大的杠杆和融資能力， 可達5億歐元， 得到了各國的擔保 (以及支付者， 發令者) 的支持。它將有各種能力向那些有系統性銀行風險的國家提供貸款，並能夠對它們加以約束，根據《穩定與增長公約》的精神， 確保緊縮政策的實行。因此， 本公約的邏輯已經成為條約的一部分， 因此不具有政府間的地位， 而是具有更大的立法責任能力。到目前為止， 它一直是可有可無的或無所作用的， 但現在的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將是更有效地實施緊縮政策的機制。

歐洲聯盟委員會的建議

歐洲委員會提出了一份 ″深化經濟和貨幣聯盟的路線圖″， 它使五位總統報告的議程得到發展和連續性， 以便促成一些措施的協定和實施， 並將在2025年之前應用它們。改革歐元區的建議是一項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該方案將於2018年6月在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上定下來。

▶ 第一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建議，是設立一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它將紮根於條約的法律框架內， 並將建立在現有的歐洲穩定機制(ESM)基礎上。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將協助處在經濟困難情況下的會員國。它還將成為單一銀行解決基金的支助機制， 在2023年可獲得550億歐元， 並將作為最後貸款人， 協助破產銀行的有序處理。這並不意味著增加額外的財政努力， 而是要利用歐洲穩定機制(ESM)的資源。作為一項金融工具， 它被賦予成員國提供的公共擔保， 支援發行具有融資能力的債券。

▶ 因此，有人提議，歐元區的這一預算工具應運作起來,或者作為銀行聯盟的支持， 以及作為短期危機時投資的穩定機制，支持那些正在進入歐元進程的成員國進行結構改革。

▶ 一攬子改革方案建議把歐洲結構和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做部分轉換， 至少6% 作為準備金， 制定適用於區域發展基金(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s)、歐洲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和歐洲農村發展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的共同規則，以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的精神，協調他們支援結構改革， 即服從結構調整的政策。2019和2020的結構改革支助方案將擴大到幾乎2億2300萬歐元，差不多加倍。

▶ 在這一意義上，委員會提出了一個 “政穩定手段”是， 它可以支持處於危機中的國家，而且留給維持投資的餘地很少。它的想法是，這個方法提供的貸款或擔保資金來自社區預算或者未來的歐洲貨幣基金組織， 雖然只有公共赤字不超過通常的3%的這些國家可以獲得支持。

▶ 在理事機構中提議設立一個歐洲經濟和財政部長， 他還將擔任委員會副主席和歐元區的主席， 這個歐洲的真正經濟政府，現在受歐洲條約的管轄。

結論和替代辦法

通過重新安排已有的機構資源和工具， 歐盟的經濟治理再次被賦予複雜的金融工具。[3] 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是一個機制，可以提高歐洲機構的金融能力， 但作為強加財政紀律的交換， 同時也是債務社會化的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簡而言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 將代表一個旨在治理我們所有人的財政鞭子。

直到最近， 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機制， 以及預算的劃分或公共支出的做法， 解釋了巨額

私人債務轉為公共債務的情況。現在， 正如在希臘情況中所看到的那樣， 歐洲機構推出了一項基金， 其機制使納稅人承受負擔和風險， 因為擔保資金源自於公共資源。因此， 公共資源以公共擔保的形式成了一種工具，意欲成為防火牆並用於系統性銀行危機。

換言之， 如果將這一基金借給一個國家，它將進行調解， 促進銀行系統的重組,部分債務由股東或債權人承擔 (8% 的負債)， 但這可能需要補償資金和公眾損失。然而， 因為擔保是公開的， 並且在操作失敗受損失的情況下，而且主要是來自他們的納稅；因為可能會有公共救援費用；因為該國被迫施行的公共政策將在工資、社會權利和公共政策、私有化等方面的調整政策的支持下進行；而且， 因為要求貸款的國家將會簽訂一份必須兌現的有利息的債務，因而一般納稅人將遭受四方的苦難。

在銀行破產危機發生時， 銀行聯盟計劃開始採取紓困措施， 即銀行危機將由股東和債權人負責。這肯定會首先發生在週邊， 義大利的銀行可能是第一個案例。歐洲機構設想的模式預測，那將是會到時必然出現的情況。中期內，有合理的原因， 認為其影響可能更為廣泛和嚴重，不過這種分析需要寫另一篇文章。

這一週邊銀行重組的機制，最終將為可能的規模更大的系統性銀行危機，提供一個工具,。也就是說， 它有利於週邊銀行的重組， 它被賦予了針對整個國家的法紀工具， 它將能夠包容歐洲中心的銀行償付能力危機的風險，但犧牲公民的利益。這就是他們 ‘眾所周知的歐元區的穩定性’，等同於銀行體系的穩定。

一項可能的替代政策應該含有兩種機制，同時包括重新分配和促進一項社會生態投資計劃， 使其能夠做出朝向基於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模式的改變， 又能儘量減少原材料和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充分滿足社會需要。

第一個辦法是有一個可供選擇的預算， 最好同收入掛鉤， 應逐步達到至少社區國民生產總值（Community GNP，把市場經濟的巨大失敗最小化的基礎） 的8%， 這個預算還關聯到各國經濟能力支持的漸進的財政制度， 基於其生產的漸進貢獻， 以及以公司利潤和富人資產為主的新稅種， 或對短期金融交易徵收的稅款， 以及對逃稅者徵收的重罰款， 這需要一個從實質性有效的最低利率開始的，層層向上的財政協調的先決條件。

這必須伴隨著重新分配支出的機制和大量的投資， 目的是改變生產模式和創造就業機會，優先考慮與生態過渡有關的任務。第二， 補充措施 （當然，不像保守勢力所聲稱的那樣是首要的)， 一種相互融資機制， 能夠為社會必要領域的公共投資提供資金， 為環境上可持續的活動提供資金，也是民主再分配的工具。[4]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 在一致同意規則和支配歐元區及理事會的國家聯盟為代表的阻擋條件下，在奉緊縮政策為圭臬而且沒有鬆動跡象的體制和條約框架內,這類事情是否適合目前的機構。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18, 2018 年 3 月。

註腳

[1]自民黨（FDP）想要施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同前財政大臣舒伯爾（Schauble）設想的一樣， 但不允許較強國家承諾為一個基金提供保證金， 而是讓市場機制自由地自動進行調整， 那就是說，沒有任何像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那樣的宏觀經濟金融機制。

[2] 雖然擔保的提供是潛在債務的一種形式， 因為在發行使基金具有金融能力的債券時發生的風險，由他們承擔。這些擔保將使損失社會化，包括投資者利潤的私有化。

[3] 其中有戰略投資計劃、外國投資計劃、多重信託基金，或者已有的歐洲穩定機制,並且現在就成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部分。所有這些基本的融資方式依賴于貸款，而貸款的基礎是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本身是由發行債券融資的，而債券由私人投資者購買，由公共擔保。與傳統的公共預算不同， 該基金不受稅收的資助， 因此為支出或直接公共投資提供資源， 但作為一種貸款機制。

[4] 相互化債務的想法不是新的， 並且左派在這方面是帶頭的， 但其目的非常不同於犧牲人民利益的，把私有債務社會化的做法。相反， 其想法是提供財政資源， 以應付危機週期， 促進再分配機制， 並依靠同他人的團結，為一些國家提供債務減免， 同時提供公共資金投資的機制。這項一致又可行的建議， 不僅在歐盟的條約和治理結構中不可接受， 而且對於計劃中的政治結構來說，似乎也行不通， 因為那個政治結構將是反對任何漸進改革的盾牌。它還面臨著跨國精英和中歐政府的頑固反對， 此外， 這些國家還依靠其半邊緣的多數政府的統治階級的意見。

我的簡要經歷回憶

張開

［編者按:張開同志於2018年9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9歲。本自述完稿於2018年6月30日］。

第一章 從家庭到學校

第一節 家庭

在五四運動爆發後第二年1920年農曆7月29日，我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第二區谿角鄉一個富農的家庭。我的祖父母養育有三子四女，“三代同堂”二十多人全部住在一間大屋內，合成一個大家庭。

鄉村的空氣清新、寧靜，我有時爬上村外的大樹看書，底下有溪水流著。全村的人都同一姓，大家互相視同叔伯兄弟姊妹，親愛善良，融洽相處，既無利益衝突，很少爭執，更不見打鬥。我的母親是一位慈祥良母，在沒有現代的節育避孕方法幫助下，生下了七子四女；終於因病而不幸在中年便遺下我們離世了。在我的腦海中，至今仍留著她瀕危時那個深夜的情景：在微弱的油燈照明下，她握著我的手，囑咐我長大後務必要“好好做人”。我的父親是長子，不務正業，更染上當時流行的鴉片惡癖而不能自拔，我母親對此自然是不滿、抱憾的。在我祖母病危時，我站在她床邊，她也不約而同地這樣希望我“好好做人”。我一直牢記著她們的教導，身體力行。

我的二叔父有二子一女，他在外面 “走政界”，在我印象中，他因過問鄉間的鴉片事情，得罪了惡勢力因而被殺，連帶我的三叔父都遭殺害。由此可見，我家也是帝國主義輸入鴉片的無數受害家庭之一。

我的祖父為兒孫取名字，孫兒一代全用桂字開頭，第二個字依次是：全歡安樂心甜和意添福。大哥名桂全，二哥名桂歡，我排行第三，名桂安，我以後讀書都用這名字。大姊名伯珍，二姊名仲英，大姊在我開始寫這回憶時仍然健在，已101歲了！

我祖父以務農獲取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他勤勞儉樸，與一些持有小量農田的鄉人聯合組成一個“圍”，再僱用貧農耕作，或分租部分農田給佃農。他被視為富農階層。他經常要步行約一小時到 “圍”工作。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是在夜晚，他經過連綿的阡陌泥路時，滑落路旁的小河，在漩渦中幾經掙扎，幸而爬了上來，不致淹死。這件事也深印在我腦海中。

第二節 入讀學校和活動

我虛齡6歲時，鄰居一位叔叔教我認字，唸“人之初” 《三字經》，再進而教讀深奧難明的《古文觀止》中的部分文言文。

1926年，我入讀谿角鄉立小學二年級，那是1925-27年中國第二次革命爆發後第二年，中國人民，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階級，紛紛起來遊行、示威、罷工，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迫，剝削工人。當時學校組織了遊行，小小年紀的我也參加了，手裏拿著紙製的小旗幟，上面寫著“打倒列強”、“除軍閥”等字，大家搖旗吶喊，齊聲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以抗議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日帝橫行無忌，多次開槍射殺工人，例如打死正在罷工的上海紗廠工人顧正紅，激起國人的極大憤怒。尤其是省港25萬工人大罷工，歷時1年4個月，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偉大的里程碑，在世界工人大罷工史上也是少見的。我當時參加遊行，腦海中仍留下依稀的景象。

由於當時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下，實行向國民黨採取國共合作的階級調和(實即投降)的政策，給予蔣介石金錢和軍火，幫助他勢力日大，最後得以大規模殘殺共產黨員，使這次革命悲慘地失敗，陷於低潮，城市工人階級失望消沉。

革命失敗的惡果之一，是國民黨實行軍事獨裁，各地的軍閥割據，自立為王，殘殺和壓榨農民；共產黨領導層在革命失敗後，不採取守勢，反而在一些地方盲目地進行暴動，把自己的剩餘力量高度消耗，被迫進行 “二萬五千里長征”(實即是狼狽地向偏遠的山區撤退)；雖然沿途加入了貧民和流氓等，但到達延安時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

托洛茨基當時先是反對斯大林的階級調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領導工農進行階級鬥爭，在農村沒收土地，分給農民，在城市革命高潮時建立蘇維埃，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被叛賣而失敗後，則應採取守勢，團聚力量，從而反對秋收暴動等盲動政策。但托氏的正確預見和主張得不到採納和實行。當時這種階級力量對比的不利形勢，其另一惡果是促進帝國主義的軍事入侵中國。帝國主義各國在1914-18年第一次大戰後，分別瓜分勢力範圍，向落後國家投資設廠，進行經濟侵略，掠取超額的剩餘價值；甚至公然佔領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企圖紓解其經濟危機，例如1928-29年的大經濟危機。

在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日帝最明目張膽的是在1931年9月18日出兵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而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則採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在東三省成立滿洲國，立溥儀為傀儡皇帝，從而把東三省由中國分割了出去。

因此，又一次激發起全中國人民的抗議示威遊行，主要的呼聲是“打倒日帝”、 “抵制日貨”。我就讀的小學也響應了，我參加了遊行示威，開始聽聞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暴行。

此外，學校又組織了一次旅行，到我所住的西鄉遙遙相對的中山縣東鄉翠亨村，參觀孫中山紀念中學和他的故居，粗略獲悉他被譽為革命家的事蹟，而中山縣名是因孫中山而把原來的香山縣名改成的。

我在小學畢業後，考入位於鄰鄉的第二區區立中學(大家簡稱之為“區中”)，讀了三年初中。在全家眾人中，我是唯一能有機會入讀中學的(除了四姑姐年青時修讀了新法接生課程之外)。

區中校長胡蔦存，早年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聘請了一些大學同學為教師，其中有黃靜波(我們尊稱他為T叔)、蔡振光，他倆在全校學生定期聽講會上，時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存在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猛烈抨擊帝國主義者，也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貪污無能(但不提及蘇聯的事情)，顯現出思想十分進步。他倆有一次在飯廳吃午飯時，恰巧與我同枱，蔡振光主動地對我說，他能觀貌辨色看相，並且說，我的眼睛顯示我將來如果走上歪路，將會做 “賊頭”；但如果走上正途，將會有貢獻於社會。我雖不信這種“相學”，但一直以此警惕自己。

黃靜波也同是中山縣第二區人，曾到北京大學讀書，與我的同鄉劉家良為同學，他們當時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參加了托派組織，並積極影響了其他人，可以說，中山的許多托派份子，都是他們發掘、教育、吸收過來的。劉家良影響了他的親弟弟劉家才，後者在鄉間組織讀書會，研討馬恩列托思想，我最初便在他的帶領下，與劉祖慶(其胞兄劉祖強也早有此思想)、彭碧舫結成讀書小組，定期開會研討政治、理論問題。我後來思想較為成熟，瞭解到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托派組織一貫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於是加入了這個組織的中山支部，當時是在參加1940年的抗戰工作中，年齡僅二十歲。

區中還聘請了一位在廣州教書的張杜若到來教國文，他住在教員宿舍，我們有時到房間請教他。他舉辦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賽，我的文章被選為第一名，貼在壁報上，我得到很大鼓舞，於是幾乎每天寫日記，多讀魯迅、王獨清、巴金、丁玲等作家的著名現代文學作品；而在小學時期，我已主動地看了很多著名小說，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這些書對我的閱讀和寫作興趣的提升，很有幫助。

在區中的同學中，有一位來自廣州培正中學的插班生王裔賢，他和我及多位同學共同出版了一份壁報(現時國內則稱“牆”報)，取名為《火車頭》，是當時全校獨有的壁報，或多或少提高了同學們的寫作、發表興趣，壁報上登載有時事評論的文章，談論國事。

在區中初中畢業後，該校沒有辦高中，我投考了廣東省最有名的“廣雅書院”，即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簡稱“省一中”)，據說，報考該校高中的每一屆都逾千人，但只取錄幾百人，競爭激烈，我幸而入選。該校師資優良，辦學傳統深厚，校園位於廣州市西村，地方寬廣幽靜，學習環境很好。

但好景不常，第二年便受戰爭影響。1937年7月7日，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帝侵略，揭開了8年英勇抗戰的序幕。我入讀省一中後，學校由於戰事的南移，被迫遷到廣州附近順德縣碧江村，我也隨校遷移。該處有許多大祠堂，用作為課室。

在課餘黃昏時份，我時常連同同學，到附近農村宣傳，期望能發動群眾參加抗日，並且組織起來。但為時不長，成效不大，因為戰火迫近而打斷。

第二章 中國托派對抗戰的主張和行動

第一節 任務和主張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簡稱中共同盟)於1937年8月15日，日軍進攻上海第3日，散發題為《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的傳單，提出：“保衛上海，使這次戰爭達到勝利，把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驅逐出境；這是我們必須擔負起和必須完成的任務，必須全體工人及一切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和前線士兵站在一道積極參加這次戰爭!”最後，傳單提出8項主張，包括：要求國民黨立即對日本絕交，立即發動全國普遍的抗戰；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財產，廢除不平等條約；組織群眾的抗戰團體，要求國民政府發給武裝；釋放一切政治犯，反對箝制民眾運動，力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反對國民黨御用的國民大會，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領導抗戰並解決國事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托派中央於9月13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案《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確定這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自然會捲入世界大戰中，我們“應該以獨立的態度，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壓迫的帝國主義以打擊，並進而解脫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

中共同盟“堅決認為中國抗戰只有靠全體民眾奮起並與先進國工人階級的反戰鬥爭，及其他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聯繫起來，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二節 實際的抗日行動

我在2005年11月寫了《中國托派對抗戰的主張和行動》一文，扼要地敘述了托派中央作出了有關抗戰的決議和傳單等以後，即把它們傳達到各地方支部，落實執行。但在開展抗日工作中，遇到了重重障礙，首先是來自中共，他們污衊托派為 “日帝走狗、漢奸”；托派在多處所組織的武裝抗日隊伍四面受敵:日軍、汪派偽軍、國民黨軍和中共軍隊都要攻打和消滅他們，不少托派成員被槍殺；加入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抗日的托派成員，例如上海百貨支部曾派新新百貨公司工作的托派成員曹鑄成到崇明島參加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也終於被查出而趕走，致使從事武裝抗日的工作困難重重。關於這方面的鬥

爭，現在把我知道的分述如下：

(一)　在廣東中山三、五兩區，由參加過1925-27 年土地革命鬥爭的托派中央委員陳仲禧同志所組織和領導的游擊隊，與日軍汪派偽軍作戰了多年，直到抗戰結束前不久，陳仲禧同志不幸在戰鬥中壯烈犧牲，這支隊伍也被打敗而潰散了。

中山有些托派成員如劉秀也曾參加了國民黨所收編組成的游擊縱隊活動，但瞭解到這支隊伍的作為在老百姓心目中並無好感，不可能把它改造成為農民的抗日武裝，最後退出了。

關於我曾參與的托派在中山的其他抗日工作，我現在記憶猶新，具體敍述如下：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軍佔領廣州，戰事更向南移。1939 年初，中山縣立中學、縣立女子中學、簡易師範學校合併，改名中山縣聯合中學，被迫遷校至中山縣東陲的南屏鄉 (鄰近澳門)。我此時已從省一中轉而就讀於聯合中學，同時參加抗日工作。

1938 年 9 月，中山縣托派組織成立了外圍抗日團體，名為“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團聚了幾間學校的師生和各鄉的青年，有 300 多名成員。團長為郭光，副團長為鄭澤鏗(別名鄭致祥)和劉家才，不久，郭光辭職，改由劉秀任團長，兩副團長依舊。

鄭澤鏗十分高大，大家都尊稱他為「LONG 哥」，是我的中山同鄉，他有時唱出洪亮的抗戰歌聲，很能感動人。抗戰結束後，他回到上海，在四大百貨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工作，與公司同事梁女士結婚，並成立百貨公司的支部，開展工作。他能說流利的普通話、英語、粵語、中山話和鄉下地方話，真是語言專家。

我與二哥桂歡(別名劉泓)、大姊伯珍及其愛人吳渭川，他的哥哥吳眥，我的二姊仲英，都參加了中青團。當時大家都在熾熱的抗日氣氛中熱心參加，以圖盡一己之力支持抗日工作，打擊日帝和汪偽漢奸。

我在參加時，劉家才替我起一名字叫劉芒(流亡的諧音，意味當時要過著類似於流亡的戰時生活)，其他一些人也起一單名，以方便呼叫。

中青團專門從事抗戰宣傳工作，號召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參加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版牆報貼於街頭，同時演出抗戰話劇，例如“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故都春夢”等；在這之前，陸績同志已組成了“克克劇社”，上演街頭劇，宣傳抗日。

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是陸績，他是我的中山同鄉，和我很熟識，在此要對他多寫幾句。他能言善道，是編劇及導演能手，也是出色的演員，歌喉洪亮動人，身材高瘦，臉圓眼大，熱情待人。他在中山淪陷後，轉到香港，與他的妻子李展開辦一間小印刷廠，編印一本刊物名《指南針》，通俗易懂，後被香港政府拘捕並遞解回廣州，在 1952 年 12 月 22 日的全面逮捕托派人員中不能倖免，長期受盡折磨苦難，最終患上肝癌，未得到好好的醫治，不幸早逝，當時只 43 歲，遺下妻子李展單獨地過活。

中青團除了以街頭演出等宣傳抗日、組織民眾之外，還派出人員協助救傷工作。在 1938 年 10 月底，日軍轟炸中山石岐鎮，由鄭致祥同志率領的救傷隊不顧生命危險，走上街頭救助被炸傷的同胞；致祥本人後來也被日軍投下的炸彈碎片射入胸部，送院急救留醫，幸而多月後復原，只留下傷痕昭示日軍的暴行。

1938 年冬，米價飛漲，是由於奸商運米到敵偽地區，牟取暴利，中青團發動糧食鬥爭，反對奸商抬高米價，激起社會和當局震動，收到效果。

在中青團成立進行工作之後，中共人員則成立了“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隊”)，在中山各學校及社會上與中青團相對抗。中青團批評中共放棄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實行階級合作，服從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抗先隊則污衊托派為漢奸、帝國主義走狗。

儘管中青團是一個抗日團體，從事抗日工作，卻不能見容於當政的國民黨，在它企圖迫使中青團服從國民黨領導但不成功之後，即命令警備司令部派兵前往中青團逮捕各成員。我們幸而事先得到消息躲避，其後知道中青團不能再

公開存在和活動，於是在街頭張貼牆報，散發《告中山民眾書》傳單，說明因被當局打壓，被迫宣佈“自行解散”。各團員隨即分散到各地進行抗戰工作。

(二)　廣西省托派成員的抗日活動主要部份是先後三次參加國民黨所組織的學生軍，第二、第三次的學生軍隨軍隊北上做抗日宣傳工作，但第三次參加後，由於中共份子製造“反托”狂潮，向廣西當局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拘捕他們，進行刑訊逼供，結果迫使他們要退出學生軍。據當時的廣西托派重要負責人姜君羊同志以蔚然筆名寫的《廣西托派史話》記述：1938年11月，南寧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積極參加到學生軍中，為抗日戰爭盡一分力量。

1939年冬，日軍進攻南寧，南寧淪陷，托派成員和同情者共同組織抗日游擊隊和戰工隊，1944年又在壇洛區各處建立“民眾抗日自衛聯隊，配合政府軍投入戰鬥，曾經進行過四次抗擊日軍的戰鬥。”

但他們的抗日工作，最後卻遭到中共份子的打壓破壞。就在那個時候，正是王明、康生一夥無恥地誣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托匪漢奸”的時候。這股 “反托”的風暴也吹到了學生軍中。那些盲目跟著指揮棒轉的 “反托”人員，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負責人、排長、班長，都大有人在。他們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要開展反對漢奸托派鬥爭的指示精神，……決定發動反托鬥爭。”

他們還“通過在學生軍政治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系頭面人物，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見1988年11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廣西黨史資料叢書《黨在廣西學生軍》第10頁)。他們採取特務的方法，盯梢、監視、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

這場 “反托”風暴席捲了整個學生軍團，從迫走了毛鴻鑑，到1939年春節過後不久在第三團逮捕李啟成，繼而不久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等13人，達到了頂點。

在逮捕楊士足等13人之後，把他們送去賓陽縣監獄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別對他們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認背後指揮者。在百般折磨之後，施刑者和審訊者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證，這13位抗日的同學竟平白無辜被關押了半年之久，受盡了牢獄之苦。

在人們蓄意泡製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學生軍工作下去為抗日戰爭出力，被迫紛紛退出了學生軍(詳見《十月評論》總第221期)。

即便是那些與托派組織、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隨風倒而有獨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會遭到排斥打擊的劫難。

在國共合謀高壓迫害之下，廣西的托派同志在服刑期滿後，有的曾出版《南寧商報》，但無法維持下去。有的被迫離開家鄉，有的轉到上海，或者到廣州或香港，多數在工廠工作。蘇燕梅、陳傳詛、徐汝璋等人轉到香港，與香港原有同志匯合，過組織生活。

(三)　托派在山東江蘇的抗日軍事鬥爭，據梁貽寫的《回顧》敍述：他在上海參加完1939年9月的中央緊急擴大會議之後，即帶著會議通過的對抗戰的決議回到山東老家，召開山東省代表會議，然後把該決議分別派到各個地方支部的同志，嗣後在濟南、趙莊、泗水、烏江、巨野等縣組織游擊隊，和參加政工大隊，他們最後都分別犧牲了。

當梁貽和我都在上海時，我們曾有過來往，但以後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梁貽來自山東，說一口山東普通話，曾撰寫《回顧》一篇長文，詳述托派同志在山東等地的抗日事蹟，內有他們備受打擊和犧牲的事實。

據台灣的國民黨中央調查局檔案所載：“托派於一九三九年在蘇魯邊境被殺。被殺者為該黨青年百餘名，近(疑是‘連’字的錯字--

--引者)該黨魚台縣縣長李貞乾及蘇、魯、豫邊區動員委員會陳籌等四十餘人。”(關於山東等地的工作，山東老同志趙芳舉寫的《夕陽憶語》詳細的敍述了他和一群托派同志站在抗日前線，參加軍隊中政工大隊等事蹟。)

(四) 浙江溫州托派組織在抗戰爆發後，認為應該積極進行抗日，起初是向中共成員提議，雙方聯合抗日行動，加入他們所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但遭拒絕，“理由”是托派乃日帝走狗、漢奸；該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是托派朱鈴等數人領導的，卻遭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但不久，該總團也很快被國民黨勒令取締了。1939年春，溫州托派決定成立溫州救亡大同盟，分成幾個支部，以抗日宣傳工作為主，但在同年7月間，托派領導的針織工會領導罷工，有多人被捕，使抗日工作受影響；1941年9月溫州淪陷，托派組織被徹底破壞。(詳見溫州曾猛、王國龍等同志寫的文章，均分別刊在《十月評論》上)。

(五) 在香港，托派成員素來朝向工人中工作，他們吸收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加強無產階級成份和意識的經驗，動員很多成員到工廠中工作，特別是在太古船塢。1938 年，日本商船“淺間丸”到香港太古船塢企圖修船，與船塢的英國資本家簽訂了 40 萬港元的修理合約，托派在該船塢工作的同志起而反對，張貼傳單號召全體工友拒絕替它修理，船塢工人響應，實行拒修，迫使該商船離港，這一反日鬥爭得到了勝利。

第三節 國民黨幫凶鎮壓托派

在後來的戰時首都四川省重慶市，國民黨政府實行嚴厲統治，托派組織的活動十分困難，多次遭到打擊破壞，許多成員被捕和監禁。1940年前後，他們共有30多人，大都在電力廠等重要企業中工作，在1945年曾勝利地進行了一次反國民黨特務的鬥爭：由於大特務田凱槍殺了電力廠工人胡世和，他當時前往田凱的渝電餐廳執行剪線任務，激發了整個電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憤，發電廠的托派成員及其同情者向特務發動了鬥爭，重慶廣大工人為此醞釀罷工，要求槍斃田凱。蔣介石迫於民憤和罷工的強大壓力，不得不下令處決自己手下大特務。這項結果帶來的轟動西南中國的效應，對蔣家王朝的崩潰也起了某種催化作用，為工人階級反抗國民黨統治寫下了珍貴的歷史一頁。

嗣後，國民黨當局又一次拘捕了重慶托派10餘人，其中7人在抗戰結束後獲釋，3人被處決，領導人王振華、黎潔霜夫婦連同他們在獄中生的兩個幼兒，從1942年春被捕時起被監禁8年後也一起被處決。他們在監禁中歷經殘酷刑訊，威迫利誘，但絕無表示過屈服。在處決前，他倆昂首挺胸，抱緊孩子，從容就義。小說《紅岩》有這段描述。這些堅強表現，在1983年8月31日的《重慶日報》等以《火中的鳳凰》和《一對寧死不屈的患難夫婦》等為題有詳細的報導(雖然後者捏造他倆變節，加上了臨刑時 “高呼共產黨萬歲”這類虛構情節，他倆終被評為 “烈士”。(詳見趙芳舉的《夕陽憶語》一書的敍述)。

當我在香港時，曾與王、黎夫婦有過短暫見面，王來自山東，身材較高，操一口山東普通話，說話流暢，思路敏銳；黎潔霜來自廣西，在港住深水埗時，我曾與她面談過幾次。我對他們之堅持托洛茨基主義寧死不屈表現深為欽佩，他倆在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

第四節 評價和總結

前面的敘述我後來也寫在《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一文內。由此可見中國托派同志的艱苦奮鬥和犧牲事蹟，而且對武裝抗日等是有決議和實際行動的。雖然由於長期受盡不同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打殺，以致力量微薄，成效不大，但努力從事各種鬥爭的歷史事實，卻是應予肯定，不容抹煞的。

可是，向青同志在1975年1976年間，曾以蘇達或馬基名字在組織內部討論中發表了《中國托派與抗日戰爭》一文指責道：“至於實際參加戰爭活動，設法在行動中跟中國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積極份子密切聯系起來，按照每一步鬥爭的需要來提出鼓動口號，藉此對抗戰發生實際影響，取得群眾信仰----在這方面，中國托派組織一絲一毫也沒有做到，而且根本沒有認真努力去做。”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沒有(只有極少的個別同志在沒有得到組織同意……下參加了軍事鬥爭)。(引自1994年1月新苗社出版的《中國托派運動資料選輯》(第一輯第4頁)。)

其實，以上所引的向青批評是相當武斷甚至近乎霸道的。試問他當時有否和各地托派一起參加抗戰活動，親自知道，或引自當時任何同志的批評呢？是否要完全照足上引他所列出的活動方法和步驟去做，才算是“實際參加戰爭活動”!他這樣的批評，等於完全抹煞托派組織(包括地方組織)及其成員在8年抗戰等過程中所作過的一切努力以至犧牲，推翻所有實際參加的同志的有關著作 (包括梁貽的 《回顧》、趙芳舉的《我們在抗日前線》、姜君羊的《廣西托派史話》，以及劉平梅編著的《中國托派黨史》所記述的第七章七個托派地方組織的抗日活動等等，彷彿他們所寫的參加抗日活動都是虛構的！難道托派各地方組織不是托派組織嗎？對於蘇達即向青對托派組織的批評，彭述之曾寫出兩篇長文，全面闡釋和逐點有理有據地予以反批評：1960年6月15日寫的《對蘇達批評的批評》，和1977年11月14日寫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理論、政綱、傳統及其幹部的歷煉-----又一次對<對蘇達批評的批評>》。(見十月書屋出版的 《彭述之選集》第四卷第168至182頁，和340至384頁。)但向青對彭述之這些批評長期以來都不見有任何回應。是不屑回答還是理屈詞窮呢？看過有關各文的讀者自有公論吧！至於中國托派領導層對當時局勢的一些評論主張和估計等曾有錯誤，彭述之在上述文章中也作了詳實的檢討和承認。

我從上引我所寫的該文曾總結指出：

第一. 托派在抗日戰爭中，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難和打擊，尤其是中共的污衊和打壓封殺，使他們的活動(甚至存在)無比地艱難。加上抗戰前所受國民黨鎮壓和抗戰結束至新中國成立後所受到的中共可怕打擊，寫下她長達大半個世紀被各個時期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歷史，其所受打擊之大和歷時之長，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第二. 儘管遭遇到那樣多而且巨大的艱難險阻，他們依然為了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和理念而堅持鬥爭，在主張和行動上反對當時最直接的壓迫者日帝，同時在思想、路線上批評及反對他們的政敵----國民黨和中共；這種批評和反對，是任何不同政見的政黨都應享有的權利，以便爭取群眾支持，最後實現自己的政綱，不應因此便給他們扣上各種政治帽子。

第三. 他們人數實在太少，與其統治者和政敵的巨大力量相比，的確微乎其微；以這樣微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殺之下實在難以蓬勃地發展起來，難以在工作上取得極大成就，反而在軍事鬥爭中最後被敵人打殺，以至消滅。如果對他們也用 “成敗論英雄”、 “成者王敗者寇”的勢利眼光，去否定他們曾經為理想而作過的努力以至犧牲，或者，指責他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做過”，那是極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對托派的理論政綱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但對歷史事實卻不應抹煞。

第四．從最早的陳獨秀向中共提出聯合抗日開始，到抗戰時托派一些地方組織要求與中共領導的團體聯合行動反對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員都秉承王明所說的：“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從而堅決加以拒絕。而且，托派成員更到處遭到中共人員的誣衊、打擊、游擊隊員被消滅。中國托派面對著這樣極端敵對而又特別強大（抗戰時擁有幾十萬軍隊，還有來自蘇聯的龐大人力、物力、財力幫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壓下的小動物，這種極為不利的處境，是一般國家各政黨之間的對立鬥爭所少見，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當時把她全部力量都動員去參加游擊戰爭，可能發展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極難改變她與國共之間非常懸殊的力量對比關係，而取得可與中共及國民黨勢均力敵的成就；但如果處於“四面受敵”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軍覆沒”、或者被敵人分頭逐一消滅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許多托派武裝成員被消滅那樣。

第五. 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員，繼續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理論主張和鬥爭道路，絕大多數都在工廠產業部門中工作，一方面與工人群眾一起，團結和影響他們，為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而共同鬥爭，在條件具備時進行罷工，同時幫助優秀的工人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另一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黨員在工人環境裏學習、鍛鍊，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起碼能保持著工人政黨的革命核心，為將來的興起作準備，這種努力是應予正面肯定的。

第三章 組織的兩次分裂

第一節 華南組織的錯誤和分裂

1939年冬，中山淪陷，聯合中學被迫從南屏鄉遷往毗鄰的澳門，校內的托派學生也跟隨著到澳門讀書和活動。

我到澳門就讀後，組織負責人寒君與我作了一次長談，其中他特別提出：由於在香港負責出版的同志不能繼續工作，領導同志選擇我接手負責，詢問我的意見。我表示這是義不容辭的，於是答應了。跟著我輟學而轉到香港。

抵港後，我入住工作地方，那是在旺角彌敦道一樓宇內，租了一間梗房，裏面擺了許多盤鉛字，像小的排字房一樣，只是鉛字數目不多，一般都是我們的刊物常用的；如缺少了便到荷里活道鑄字店補購。原來負責的林華煥同志簡單地告訴我：排好一版字後，用一條沾好油墨的膠轇在鉛字上掃過，再把白紙壓在鉛字上，便可印出。這種原始的人手印刷，往往印不全所有字體，需要大力地多試。就這樣一個人從朝到晚單獨地工作，不與別人來往，只有方少儂(方秋心)女同志來聯絡，帶來稿件和我的生活費用等，離開時再帶去“製成品”，其中重要部份是對外散發的抗日傳單和宣傳刊物，其餘部份是內部討論文件。方同志後來移民美國，不幸早逝。

1938年，廣西一位托派青年黃傑到香港，找不到工作，難以生活，去找以前在南寧中學執教的老師胡蘭成(又名胡蘭澄)求助。胡在漢奸報《南華日報》任編輯，在資助一些錢後，胡向黃傑提出，願以私人名義出資幫助托派出版書刊。據黃傑說，胡是托派的同情者。寒君等華南區臨委討論後，同意胡的建議，接受過胡二、三百元出版《二十世紀》雜誌，胡要求一張收據給他作紀念。

上海中央常委會事後得到華南區臨委的有關報告，表示絕對反對，指令華南區臨委立即停止收受胡蘭成的捐款，把已收過的捐款全部還給他並討回收據，且斷絕與胡蘭成的關係，該刊物也停刊了。華南區臨委其後服從中央常委會的決定，並加以執行。

中山淪陷後，曾經是托派份子的蔡俊光，由於留學日本，通曉日本語文，日帝軍官迫使他擔任日軍翻譯，因而時常隨日軍官員乘車出入。

托派上海中央在得知上述胡蘭成和蔡俊光兩事後，認為華南區組織對黨員的社會關係及其行為的管束沒有重視，蔡俊光的行為表現組織沒有接受胡蘭成事件的教訓，因而在1940年3

月的《鬥爭報》上，刊登了解散華南區組織的通告，原因是華南組織不純。

由華南區臨委書記寒君及其領導下的南方一些同志反對中央的解散措施，寒君認為，“即使是敵人的錢拿來幹革命事業有何不可呢?”他的意見是可以的，因而接受了胡蘭成的捐款去出版刊物。但中央則認為是絕對不可的。早在1930年代，中國托派已一直被中共無中生有地誣衊為收受日帝敵偽的金錢資助，替他們效勞，因而長期扣上“托派漢奸”的莫須有帽子(儘管中共並沒有舉出確鑿事實作為根據)。如果收受了胡蘭成的捐款，那不是自己人提供彈藥給中共利用來證明其污衊確有事實根據嗎?為了維護托派一貫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純潔清白，上海的中央領導層在得知華南區臨委的錯誤後，立即採取上述的斷然措施，實在是正確而必要的。劉平梅是贊同寒君們的意見的，因而在他所撰寫的《中國托派黨史》中加了許多不盡客觀公正的敘述，比如爭論“最少有相當大的數量的不純份子，才能說華南組織不純”，來為當時的錯誤辯護，表現出他和寒君們完全不理會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清白問題的必要性。寒君們既不認識自己的錯誤，又以拒絕重新登記而造成華南組織分裂，實在是一錯再錯。

在此順便指出：上引《黨史》一書，在撰寫前曾與少數派鄭超麟等人長談並作記錄，對彭述之、劉家良等多數派作了許多不夠客觀公正的敘述，我在此不想詳細指出，將來有時間再作討論。

我當時是支持中央常委會的上述意見和措施的。我除了白天工作外，傍晚到香港堅道一間開辦於左派中學內的新聞學院上課，講師有著名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喬木等，講授新聞採訪及撰寫、報刊編輯以至標題選取等。范長江1941年在香港與鄒韜奮等創辦了《華南報》。

第二節 對抗戰態度的爭論和分裂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的6年間，上海組織不斷遭到國民黨破壞，從中共退出的領導人及幹部，在1931-34年間，被捕而監禁者在30人以上，到1936年止，領導機關共遭到5次的破壞和成員被捕，但除了幾個人投降悔過外，其餘的都堅持不屈，多數先後獲釋，而陳獨秀、彭述之、尹寬等則到抗戰爆發後才獲釋放。這許多打擊，使組織渙散，不少成員消極退出。上海只有3個支部存在。

1937年7月7日，日帝發動侵華戰爭，中共同盟在9月15日發出傳單：《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號召全國人民動員武裝起來，並組織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到前方參加抗戰等。托派成員在各地積極參加抗戰工作，但他們在山東等地組織的武裝游擊隊卻被國共兩方軍隊所圍攻、消滅。全國各地具體詳情已在前面一一敘述。

1939年9月13日，在我赴滬之前一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其中對於抗日游擊隊的態度是：“盡量參加”、“以勇敢的抗日行動爭取群眾的信仰，並靈活地宣傳土地政綱，在可能時首先沒收漢奸地主的土地分給貧民。”

1940年，由於上海也缺乏技術工作同志，需要我去，於是隨同來港解決華南組織問題的歐伯(大家對彭述之的尊稱)，乘搭太古輪船由港抵滬，我租了一間 “亭子間”居住，在入房門口的頂上，以及房內的木板上，我揭開了，把許多內部的檔案等放進去，需要時才拿出來用。安排好後，我便開始排字、印刷等出版工作。

抗戰爆發後，托派中央對抗戰態度分成多數派與少數派：多數派在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向國民黨屈從投降的同時，又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國際領導人的意見一樣，認為中國是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抗戰具有進步意義，應予以支持，以打敗日帝；少數派則認為：抗日戰爭沒有進步性，對之應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其中的鄭超麟(意因)從一開始即認定無進步意義，王凡西(連根)、陳其昌(室川)、樓國華(穀禾)等人則認為：抗戰初期雖有進步意義，但後來，抗日戰爭與太平洋日美

戰爭糾纏在一起，已變成帝國主義戰爭一部份，失去其進步性，因而他們不再支持中國的抗戰，改而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與鄭超麟幾年前已採取的態度一樣。可是，如果是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則按照第一次大戰時第二國際左派的主張，是“主要敵人在自己國內”，應先打倒主要敵人(即本國統治者)了！這對於侵略和蹂躪著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是非常有利嗎？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珍珠港和香港等地，駐守香港九龍的英軍敵不過日軍，香港為日寇所佔領，陷於非常黑暗時期，工廠紛紛停產，大量工人失業，市面糧食缺乏，人民生活異常艱難困苦，許多人被迫到內地偷運糧食回港維生或售賣。有一天，劉平梅及其妹為躲避日軍濫殺平民，逃到山上，但他又被日軍砍傷，幾乎斷了命。寒君等人居於港島筲箕灣工人貧民區，他後來又患上肺病，在貧病交迫中悲慘地逝世。

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成員，自從被中國共產黨開除而在後來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後，就連續遭到國民黨政府打擊，所有領導人先後被拘捕，判處多年監禁。

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彭述之和陳獨秀，對於民主運動與不斷革命，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民眾政權，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及策略等問題，雙方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和爭論，可見於《彭述之選集》所引述的陳獨秀意見及彭述之的批評，以及坊間近年來大量出版的陳獨秀文集 (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而由唐寶林編著的《陳獨秀全傳》)陳所發表的意見中。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彭述之、陳獨秀和尹寬、鄭超麟、王文元(又名王凡西)、劉家良等人都獲得釋放，其他的人都重回上海恢復組織工作；陳獨秀卻獨自到武漢，公開表示： “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

而對於共產黨，則擁護 “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上引文俱引自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698、700、702頁）。彭述之如實地批評陳這些表現為 “右傾機會主義”。

在上海的領導人，對於抗戰的態度、意見立場正反的雙方都紛紛寫出其書面見解，提出其理據，闡釋自己的論點，批駁對方，十分熱烈。例如，劉家良以耀如名字寫出三篇長文，詳細闡釋太平洋戰爭並不能改變中國抗戰的進步性質：第一篇《日美戰爭與我們目前的幾個爭論問題----評連根的<討論大綱>》，第二篇名《小創不治，將成壞疽》，第三篇是《答覆幾點詭辯》，共約3.6萬字，直到不再爭辯。多數派的意見，逐點有理有據地駁覆對方----王凡西們。我當時完全贊同多數派的意見，並寫了一文刊在“內部生活”上。所有的爭論文章、檔案都收集在《保衛馬克思主義》為名的內部討論文集內，共分成4卷，其中第2卷又分上下卷，做到有文皆登，內容豐富，浩浩瀚瀚，充分表現出內部爭論的完全自由、民主。這4卷集以臘紙油印印出，我不善於刻寫臘紙，只刻了一部份，主要是做印刷等工作。印好後，發到各地(包括廣東、香港、廣西、重慶、溫州、山東等地)，也有小部份同志同意少數派意見，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總結出兩種對立意見及支持的地方代表，而以支持抗戰的人佔絕大多數。後來，少數派要求中央領導同意他們在黨對外宣傳的機關報《鬥爭》上發表他們對抗戰的不同主張。中央領導的多數意見仍然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一貫原則：經過內部充分民主討論，集中多數意見對外執行，少數可保留意見在內部繼續討論，但須服從多數；因此，不同意他們對外發表少數意見的要求。但鄭、王、樓等不肯服從多數，實行以“國際主義者”名義，出版“國際主義”刊物，公開對外散發。中央多數派認為這樣已形成組織的分裂，少數派已自行分裂出去，不再屬於“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成員了。

最後便由於少數派的繼續“對外發言”，而脫離開去，從而造成了重大的分裂。少數派先是在政治上犯下原則性重大錯誤，再犯下分裂組織的錯誤。

第三節 組織分裂的責任

王凡西後來在他的自傳的“組織分裂”一章裏辯解：“組織分裂乃由於一個關乎一個組織原則的步驟。在1941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個所謂中國托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因病沒有參加)在會議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領導機關，其成員全體屬於多數派。我們對那次的會議的準備和進行都不滿意。但接受了它的結果，自安於少數的地位。不過，我們要求一個權利，即在機關報《鬥爭》上闢一討論欄，雙方繼續問題的闡明。新中委會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自行出版內部生活，後來我們命名這個獨立輯印的內部生活為《國際主義者》，以此同時對黨內黨外的革命者發言。我們這樣作的時候，同時聲明中央如答允我們在《鬥爭》報上開闢討論欄的要求，隨時可以停刊《國際主義者》的。以彭述之為首的新常委會，不允考慮我們的要求，並指出少數派的行動破壞組織原則。如果繼續發行，則宣佈所有的反對派同志已自動脫離了“中國托派”。(自傳285頁)

就這樣，於1931年5月1日統一起來的中國托派，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再陷分裂，從此便以兩個組織存在著，迄今不曾合併(自傳285頁)。(以上引文引自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的陳碧蘭著：《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470頁)。

陳碧蘭批評:

王凡西歪曲關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事實，其目的是企圖把分裂的責任嫁給多數派，特別歸咎於彭述之。現在我應當而且有責任把事實的真相弄清楚：首先，王凡西說：第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新的領導機關，其成員全體屬於多數派”。這便意味著多數派是有計劃的排除少數派於新的領導機關之外，這完全是背著良心故意說謊！事實是，第二次大會開會時，少數派曾派陳其昌和樓國華出席。當選舉新中央委員時，多數派的代表曾建議選鄭超麟和王凡西為中委，陳其昌和樓國華堅決地拒絕參加新的領導機關，企圖阻礙它的產生，因而多數派只好從自己的代表中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以便執行大會的決議……。

王凡西說：少數派“對第二次大會的準備和進行都不滿意。”為甚麼不滿意呢？他沒有說出其原因之所在，好像暗示著，“大會的準備和進行”，不合乎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在這次大會召開之前，關於兩派政治方面的分歧意見，僅關於抗戰變質論已討論了半年之久，兩方面爭論的文件，集成了好幾大冊的《內部生活》。正如王凡西自己所說的：“這可以說在政治上已經充分民主的討論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在組織方面，出席大會的代表，完全是按照各地方黨員人數的比例選出的；而且少數派所派的代表，卻遠遠超過他們人數的比例。他們一共只有四個人，卻派出兩名代表。像這種苦心孤詣（由於我們環境的惡劣，托派運動稀有的艱難），這樣對他們讓步，超出他們人數比例選舉代表的寬大民主程式所準備和進行的大會，他們還不滿意……。

現在我應當進一步地來檢討組織分裂的責任究竟誰屬的問題。直接促成組織分裂的確如王凡西所說：“乃是由於一個有關組織原則的步驟。”事實是：在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問題的決議之後，多數派曾經答允以後在《內部生活》上繼續討論政治的分歧意見，但少數派卻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一個權利，就是在《鬥爭》機關報上，闢一討論欄，雙方進

行政治意見的繼續討論。當新中央拒絕了這一要求之後，少數派便自行出版《內部生活》，隨後改名為《國際主義者》，“……同時向黨內外的革命者發言”。像這樣的要求和行動，是否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呢？關於這個問題，最合理而又最準確的判斷，我們只要引證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三九年末和一九四零年所發生的分裂故事來對照一下，便足夠證明一九四二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分裂的責任究竟是由誰來負責的問題，那便明若觀火了！

當一九三九年秋，社工黨內部因德蘇協定所引起的關於蘇聯性質的爭論到達高峰時，班納姆 (James Burnham)和夏克曼(Max Schackman)所領導的少數派，曾要求在黨的機關報上----《社會主義呼聲》和《新國際》，闢一討論欄：以便雙方闡明自己的意見。但以加農 (James P. Canon)為首的多數派，卻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更有意義的是：托洛茨基不但完全支持加農派的立場，而且對班納姆和夏克曼派的要求作了如下的深刻批評：“《新國際》和《社會主義呼聲》，不是在特別討論委員會控制下的討論工具，而是黨及全國委員會的工具。在討論的內部公報裏，反對派可以要求與多數派同等權利。但黨的正式機關報卻有保衛黨和第四國際的觀點的職責，直到這些觀點改變……。”(《保衛馬克思主義》英文本65頁)(引自陳碧蘭所著同上書470-473頁)。

第四章 托派同志深受的苦難

第一節 在日帝鐵蹄踐踏下我們的被捕

1941年12月8日，日帝偷襲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戰爭，日軍開進上海英租界，而我們當時全都住在英租界。我當天清晨外出晨運時，在滬西馬路旁看到日軍開進來，知道英租界已在日帝直接統治之下，連帶我們也如此了。在日帝統治期間，上海的中央與各地組織的連繫和日常工作便變得非常困難。當時的地區組委會負責人為籍雲龍、鄭致祥和蔣振東3人。

當時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是大家(尤其是歐伯)家裏存有許多檔案和書籍，要找個地方安放。於是由李永爵和我在街市租了一個小檔位，作為買賣舊書，並零售文具用品雜物，四週釘上木板，離開時上鎖。就這樣把書存在該處，白天由我倆交替看守，算是勉強解決了大家的問題。

1942年夏天，上海一間絲綢廠工人因待遇問題罷工，我們有兩位女同志印蓉秋和羅子玲(羅真)在該廠工作，成為工人代表的罷工領導人，被扣押起來；另一位女同志楊玉瓊事前雖遭到組委會的反對，但仍擅自送飯到拘留室；警方見她是一位知識分子，不是同廠工友，懷疑她是共產黨人，把她扣留，逼供盤問，在毆打及威嚇之下，她經不起考驗，供出了劉家良和彭述之及其住址，幸而他們在楊被捕後都及時離開上海，彭述之陳碧蘭夫婦及其女兒，到崑山的同情友人嚴雁賓祖家暫住；劉家良當時患了腎結核病，正住在醫院醫治，剛做了割除腰子的手術，還未復原，也被迫要出院轉到溫州躲避；但是替他租住所擔保的高擎宇則被牽連而被捕。在拘捕他時，歐伯也在他處，聽到樓下的說話和嘈吵聲(高擎宇故意吵鬧以便彭知道)，立即跑上天臺，跳到鄰居天臺躲避，才免於被捕，但這樣的跳越是很危險的，有可能因跳不過去而從高空跌下去，幸而成功無事。由於我和家良一家人同住一層樓，他們住前樓，我住在後面的“亭子間”，房東說是我介紹他們來租住的，且和他們是同姓兼同鄉，關係密切，家良一家去向，自然要找我查問。同時，警方在家良住處找到一張精武體育館會

員咭，查到該會，知是該館工作的李永爵介紹取得的，警方於是要拘捕我和永爵，以追查家良下落，因為他們據報，家良是僅次於彭述之的第二號領導人。

我同永爵本已約好在大世界遊樂場門口會合一起去溫州避難的，但警方從永爵朋友獲知我們的約會地點和時間，於是前往把我們拘捕，交由警員總局的特高科審理，追問組織情況和家良等人下落。我因為上述的與家良的密切關係，所以對我的逼供追問特別嚴酷；日本憲兵在旁監督提示，華人密探為虎作倀，從被帶至偵訊處的黃昏時起，直至凌晨4、5小時，他們輪班工作及休息，我則一直不停地被折磨：從拳打腳踢，到用通了電的電棒直擊我身上的敏感處。我仍不供出，便被綁緊在長櫈上，頭低垂下向天，密探則坐在我身上，用水喉水直射入我鼻子內，令我透不過氣來，張開口呼吸又被水衝進口中，充滿了體內。這種灌水逼供令人難以抵受的痛苦，真非身受其害者所能體會的。但我拼命忍受，堅拒供出任何內情和其他人的行蹤，使日偽們毫無所得。到次日上午再提訊時，我依然堅拒，換來他們又一輪毒打，我隨即到廁所飲下我的尿來解傷痛。永爵所受的逼供折磨也和我差不多。事後聽到他們稱我倆為“好漢”。

次日上午再提訊時，永爵、楊玉瓊和我坐在一起，我們被禁止說話，我只好用手指在椅子上向永爵寫出：越不怕死，越不會死，頂硬上，捱過去！

我再看楊玉瓊，她披頭散髮，目光呆滯，已經像是神經錯亂的人。她可能也自知供出了家良和高擎宇等人的地址，完全是出賣同志、背叛組織和大家信奉的事業之所為，是絕對要不得的錯誤。但她在敵人毆打逼供的威嚇脅迫之下，已經神經失常，喪失了理性，供出了組織的情況和她所知的同志住址；如果她冷靜下來，能回想自己的供認是出賣同志時，也許會羞慚自責，更加刺激她的神經錯亂，加劇她的瘋癲發作。

囚室分開男女，男的一間可收容十人，眾人擠睡在水泥地上，近鐵門口旁有水喉和廁所，還有小小空地，可供來回踱步。吃的是每頓一個小鐵碗盛著的半硬稀飯，內有粟米或土豆，但絕少有肉。有的人不夠飽，便吃別人剩下的“殘渣”(如仍有餘的話)。高擎宇老師(又名高翬)，以前在中山縣立中學任教時，曾教育及吸收了許多學生加入組織，平時抽慣了煙，囚禁中無法取得香煙，對他是非常難受的事，他於是用踱步來消磨，克服困難。

囚室外的走廊天花板上裝有電燈，微弱的燈光照著室內，看守常來巡視，點點人數，便又退回外面。

我們共三男三女(除楊玉瓊早些釋放之外)，被拘留了三個多月，卻找不到任何犯罪證據；經過蓉秋托她的堂叔與警局中朋友疏通，終於無條件釋放。

楊玉瓊獲釋，繼續神經錯亂，在滬西的街邊垃圾堆中找食物，羅麗萍家人給她食物和衣服，但衣服也不穿。李瓊同樣見她裸睡在滬東的街邊，後來聽說她餓死了。

楊玉瓊長得高大健碩，在中山讀中學時是一個出色的排球、籃球好手，曾被選為女子排球隊廣東省代表，參加全國運動會。後來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轉到上海。她為人主觀很強，不聽其他同志的意見，不應獨斷獨行去探監送飯，以致害己害人，最後斷送了自己的生命，成為日帝敵偽鐵蹄下的受害者之一。

上述關於楊玉瓊的發瘋情況，當時似乎所有知道她的朋友都是公認如此的。但在經過大半世紀之後的近年，卻有當年知事者獨持異議，說楊當時並沒有癲瘋，而幾位現在仍健在的當時經歷者(包括鄭鏗和我)，則仍維持舊日這個記憶。李永爵寫的回憶是如此寫著：“楊玉瓊一下子神經錯亂……已全瘋了，…由羅真把她送去瘋人院。……聽說不久楊即逃出來，餓死在馬路邊云。”(見李永爵寫的《坎坷》一書40和43頁。)

第二節 大陸托派同志長期慘受折磨迫害

在此次事件中同遭拘禁審問的李永爵和羅

麗萍，第一次在拘禁患難中相識，獲釋後在1947年結婚，但在結婚一週年時，卻無辜地一齊被國民黨政府抓去，當作共產黨疑犯監禁起來。嗣後獲釋了，在1952年12月22日晚又被中共當局逮捕。兩夫婦進進出出牢獄3次之多，備受3個不同統治者折磨。羅麗萍其後雖得以返家，卻患了舌癌，於1988年病逝。李永爵則繼續被中共政權監禁、勞改、管制達35年之久，他到晚年還受癌病折磨，在2008年1月2日去世。他倆夫婦為了追求革命理念，獻身於人類解放事業，而歷盡苦難。永爵把一生的遭遇，包括對其他許多戰友的親切回憶，寫成一書，取名為《坎坷》，在他離世前不久出版，確能真實地反映現實，也是對這個極不合理的社會，特別是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和抗議。我與李永爵同志相處的時間頗長，大家感情很深，每當想起他，我便難過不已。在他逝世的噩耗傳來後，十月評論社同仁隨即交由我起草了《悼念老戰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一文，刊載於《十月評論》總第224期上，以表永遠沉痛悼念。

李永爵的遭遇，實際上也是其他許多人的遭遇，1952年的冬至日，全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遭到全面大逮捕(甚至連他們的家屬和同情者都受株連)，他們許多人過著差不多與永爵相類似的艱苦困難日子，失去自由達幾十年之久！

據上海學者吳基民指出：1952年冬至日，“全國公安，一齊行動，將留在大陸的全部托派以及他們的同情者1000餘人全部逮捕，無一漏網，主要骨幹被判了“重刑”。(引自吳基民著《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一書163頁，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年4月初版。)

1957年，毛澤東提出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呼籲人民起來批評中共，而且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人民踴躍響應發表意見之後，毛澤東便言而無信，聲稱已經“引蛇出洞”，要全面進行“反右派鬥爭”，把其中的“右派”份子揪鬥。事後據稱有百多萬人被扣上右派帽子，受盡勞改、監禁、改造等屈辱、折磨，其中許多人更達30年之久，與托派份子所受的頗相類似。這是中共官僚層專制獨裁的無數罪行之一。

我在上海的拘留所時，有一天來了兩位商人：一是蘇州錢莊姓蔣的老闆，另一是蘇州一間銀行的經理。他們答應替我找一份工作。我獲自由後，為了暫避風頭和暫時解決生活，便到蘇州找他們，在蔣先生的永盛錢莊工作。

工餘之暇，我常到蘇州有名的滄浪亭所設的公眾圖書館閱覽報刊，和借出書籍，其中有日文書，我譯出了一些。

我在蘇州生活了一年多，其間曾在假日獨自到附近的虎丘山、寒山寺等名勝古蹟遊覽。有一次，3名新四軍突然持槍從山峰衝下，向我盤問和搜身，然後放行，這是我第一次遇見到解放軍。

1944年末，臨近抗日戰爭結束，我離開蘇州回到上海。

第五章 抗戰結束後我們的工作

第一節 內戰擴大和我黨的態度

1945年8月，美軍向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迫使日帝宣佈投降，太平洋戰事結束，中國抗戰也宣告“勝利”。

但戰事並沒有完結，國民黨向中共解放區的進攻反而更加擴大。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委會於1946年1月16日，發表了《戰後國際及國內時局主張》，分析了戰後中國的局勢是：在國民

黨的軍事獨裁下，更顯出稀有的貪婪暴虐和腐敗無能，對民眾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施行刮骨吸髓。如果沒有狂風暴雨般的工農革命起來推倒，是絕不會自行退位的。

共產黨 “已墮落成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由於它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又放棄了土地革命政綱，聲言 “願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共產黨高唱 ‘民主’，是惡毒的諷刺，從斯大林到中國共產黨，是官僚專制，根本缺乏民主的。

“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間不斷進行的種種鬥爭和混戰，固然根本上是由於國民黨企圖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隊伍和群眾組織，是極端反動的。但這同時亦是共產黨多年來一貫的軍事投機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眾革命力量起來干涉，國共兩黨間的衝突是不會得到正當解決的。” “政治協商會議絕對不能徹底調解國共本身的根本矛盾”。國共兩黨間的矛盾，只能循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或者共產黨徹底投降，“否則，兩黨的決戰總是無法避免的”。

文件接著提出13點具體主張，號召民眾積極起來為實現這些民族民主權利而奮鬥。

在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解放區進攻後，我黨中央常委會於1947年2月13日通過和發表了《關於中國內戰的決議》，其中指出：中國抗戰後的主要形勢，是美帝國主義做了中國的主人。因此，托派總的策略口號改變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民黨”，“凡是一切有利於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鬥爭，我們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黨派共同行動。” “在內戰中把同情放在斯大林黨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方面，堅決反對國民黨”。因此，“解放區中的托派將毫不猶豫地站在農民方面抵抗國民黨的反動進攻。”“在蔣介石的後方，托派則提出無條件停戰的口號，並支持群眾每一種反戰與和平的運動，發展和加深中國群眾的階級鬥爭。”我當時認為這種態度是非常正確的。

第二節 出版公開期刊

我們在各地的許多同志和友好在抗戰結束後到上海聚集，重新開展工作，其中一項是出版公開的期刊，一份是綜合性的大型月刊《求真雜誌》，先得到一些同情友好的經濟支持，由彭述之主編，邀請不少當時著名的譯作家、學者撰稿(例如李季、蔡尚思、唐虞世、胡山源等)，並得到不少學者(嵇文甫、王亞南、唐虞世、郭大力、張大軍、李毓基、朱維鏞、冰夷、西岑等)投稿討論。彭述之所用筆名為陳人白、歐伯、鶴皐；劉家良筆名為劉少嚴、海明；陳碧蘭筆名為碧雲。我除了參與校對等工作外，也以康君筆名撰寫時評和翻譯一些文章刊出。其他朋友如籍雲龍則以竹雲龍、謝少翁筆名發表其小說，王凡西在第9期也發表了一篇《論憲法的本質》譯文。《求真雜誌》從1946年5月1日創刊，到1947年1月1日出版了最後一期後停刊，合共出版了9期，每期80頁。

《青年與婦女》在1946年3月20日創刊，每月1期，每期36頁。1年半以後，改名為《新聲》，至1948年12月1日，由於中共軍隊迫近京滬，《新聲》出版了第3卷第7期後停刊，一直都由陳碧蘭主編，她用韻霓、群音、碧雲等筆名刊出文章；彭述之用的筆名是旭東、鏡微，他在《求真雜誌》停刊後較多地為《青年與婦女》撰文；劉家良用的筆名是紀芬、翟光；籍雲龍用的是竹雲龍、華貝筆名；我除了負責校對、對外通訊聯絡等之外，還幾乎每期分別以劉乃光、唯康、流光等筆名撰文刊出。溫州的周仁生(筆名沈念)常寄來通訊和譯文，香港的阮仲琦(筆名招志堅、張志堅)等也寄來地方通訊，學者胡山源、林漢達等也有來論，都一一刊出。

上述各月刊行銷到全國大城市，許多相識而失散多年的朋友、同志，從其中的意見、主張等，得知我們已恢復活動，非常高興，紛紛來信連繫，有些朋友則經此途徑而到上海找到我們。

在出版公開期刊的同時，彭述之又主持政

治、理論學習班，借用上海育才中學的課室，講述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哲學、經濟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舉行座談會討論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他講時不假思索，滔滔不絕，講話內容豐富、有條有理，很能吸引人，每次都有三十至五十人參加。我當時也每次必到，獲益良多。這些講話和討論會記錄，部份發表在《青年與婦女》或《新聲》上。

彭述之又曾以大學教授身份在上海一些大學講課，影響了一些進步大學生，他/她們有些人也曾參加學習班、座談會，討論問題，替《青年與婦女》等刊物撰稿，例如詩人陳景光(筆名陳曦、藍天)、謝山(筆名嵇山)等人，他們後來又加入成為黨員。

在此之前的1938-41年，中國托派公開出版刊物，如《動向》、《西流》和《破曉》等小冊子，出版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初版用《蘇聯現狀與前途》為書名)、《俄國革命史》三卷集，以及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十多本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領導人寫的小冊子，在社會上產生不少影響。

距今20多年前，我與訪港的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一位華裔館長晤談時，他說在哈佛圖書館仍存有《求真雜誌》；與此同時，我電詢香港一間最大的公共圖書館的職員，據答該館也存有《求真雜誌》；但在香港回歸後已在一次清查圖書館書刊中被剔除了。

前少數派的王凡西、鄭超麟等，從1946年6月1日起也出版了《新旗》半月刊，但在1948年7月1日出版了第19期後也停刊了。

第三節　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8年8月20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召開了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先由彭述之起草《黨綱》，劉家良起草《黨章》和《組織原則和方法》等草案，分發到各地方支部，全國共有10個地方支部(上海、香港、廣州、廣西、溫州、杭州、中山、山東、四川、南京)，進行了會前討論各份草案文件，選出代表13人參加，加上前中委犀照(即彭述之)、耀如(即劉家良)及陳碧蘭、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康溪(即徐可康)、特邀代表尹寬、俞守一(黨名梅爾端)參加，合共19有效票。我被上海支部選為代表之一，又接受中山支部委託為代表出席。我被推選為大會的秘書長，並與香港代表震炎(蘇燕海)同志一起負責大會記錄。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組織原則和方法》和《黨章》，並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中國革命共產黨”。

大會選出了彭述之、劉家良、陳碧蘭、俞守一、尹寬、劉毅、阮仲琦(黨名真漁)、戴顏(黨名佘獨夫)、和王國龍9人為中委，樸克(鄭澤鏗)和籍雲龍為候補中委，我則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此外，黨所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也於大會之前在全國各地有黨組織存在的地方發展起來，全國人數較少於黨員人數。

在《黨綱》通過之前，大會先對《黨綱》草案逐個重大問題(由各小標題即各章來分開)討論，然後分別表決。總體來看，較重大的分歧是在第二章 “革命的任務、動力及其性質”，主要為香港代表震炎和戴顏所提出及付諸表決，大體上只有香港兩票支持，而支持犀照原草案意見的則有17票。主要的歧見是：草案提出，中國革命是以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個民主革命不斷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 (這也是托洛茨基起草而由第四國際正式通過的《過渡綱領》的意見)；但香港代表則表示反對，而認為“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應在於社會主義，並非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提出議事日程，無產階級起來作廣大鬥爭企圖完成民主任務的時候，必定要侵犯私有財產權，那時革命的性質便帶上社會主義性”(錄自震炎經過重抄好的他的記錄第11頁)。

劉平梅所編撰的《中國托派黨史》，在敍述這個爭論時就更明白地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以此排拒了不斷革命論的從民主革命不斷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同時對彭、劉作了許多攻擊，反映出他在

撰寫該書前曾與鄭超麟和蘇達(即向青)作了十多天的長談和獲取的資料，他們三人都與彭述之、劉家良有過激烈的爭論和很深的積怨，因而顯出該書不夠客觀、公正。

前少數派於1949年4月27-28日，在上海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全國有100多人，在上海有64人)，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出鄭超麟、王凡西、樓國華等7人為中委，其後，王、樓和梁貽三人即離開上海南來香港免為中共逮捕，鄭超麟及其他留下的成員則不能倖免，鄭的刑期最長，同革共黨的一些成員幾乎一樣。

第四節 共軍南下我們被迫離滬赴港

黨大會後，鑒於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官僚層對托派的殘酷迫害追殺，而中共則一直追隨斯大林對托派的污衊打擊不遺餘力，當中共解放軍在1948年末已南下到長江北岸，即將渡江佔領南京、上海，屆時在中共統治下，托派組織和中央領導人等將無法繼續存在，於是召開了緊急會議，在上海的全體黨員和團員一致贊成，中央政治局必須遷至南方，上海則成立一個江浙臨時委員會，選出劉毅、林斯、丁毅三位同志擔任，負責與各地的組織聯繫；同時決定，各黨員團員設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團，或工農組織，在政治方面則支持中共的一切進步措施；有些為中共所認識的成員則需離開上海，與別處的一些成員來滬對調工作。尹寬原本約好與其他同志一起離滬南下的，但當他們齊集碼頭見面時，尹寬卻表示不願一起南下，而要重返安徽鄉間。其後不久，他被捕，死於中共的監禁中。

1950年，上海的江浙臨時委員會三位成員被捕。據劉毅後來說，他從牢房窗口看見他以前接近和介紹入黨的一名同廠男工人，自由進出警局。他們不需逼供，但須承諾以後不再活動，很快便釋放了。他們認為中共已熟知托派內部情況，表明有內奸早已打入黨和團之內。他們獲釋後，隨即也離滬赴港。

這種發展顯示，彭述之等人如果不及時離開，也會同他們一齊被捕，但結果卻不會一樣。1952年12月22日和1953年1月8日，全國托派成員 (包括過去曾參加而在當時之前已退出的)和同情者同時在各地被拘捕，這也顯示中共對全國托派情況早已瞭如指掌。

彭述之們南下廣州不久，解放軍已迫近華中，他們被迫要再轉到香港。當時的中委會，由南下3成員，加入了1948年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在港二成員(焦勵夫、戴顏)共五人組成及運作。國際主義工人黨 (前少數派的領導人和成員也同時被捕，除王凡西、樓國華和梁駟及時南抵香港之外，留滬的鄭超麟等被監禁或失去自由，長達29年之久)。後來，由於香港組織連續有幾批人被捕及遞解出境，彭述之也發現被港英偵探跟蹤，一再遷居仍不能擺脫，在得到越南托派同志幫助下，他們於1950年1月前赴越南。數月後，因為當地托派組織被滲進了越盟份子，後者聲稱越盟佔領區有一位參謀長 (‘以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邀請越南托派負責人和劉家良前去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有軍隊保護，無危險，於是他們應邀去了。但在歸途中卻把他們逮捕，劉家良不久即病逝於獄中。這樣地失去幾個重要領導人，對於中越兩個托派組織的打擊很大。劉家良當時還是壯年，政治理論水準高，寫作及工作能力強，他的逝世是托派的無可補償的重大損失。

彭述之夫婦感到在越南處境已很危險，香港同志也告訴他們，中共已知道他們居於南越西貢市，建議他們必須離開，並盡力在經濟上資助所需交通費。他們於是在1951年5月26日乘船流亡歐洲，後來再轉居美國，得到美國同志的經濟幫助，生活安頓下來，參加國際托派運動的工作。彭述之在1983年病逝於美國，終年89歲，陳碧蘭1987年病逝於香港，終年85歲，走完了他們作為革命者的艱苦而堅毅的最後人生歷程。

以上所述的中國托派重要領導人和成員的遭遇，反映他們從持有不同政見時起的大半個世紀內，持續處於備受壓迫的地下活動之中，歷盡所有統治者 (從國民黨、日帝、英帝、中共，以至越南的越共)的殘酷迫害、無理監禁，甚至

屠殺。受不了這種高壓的成員都先後消極離隊，那些堅持信仰理念的則工作困難，生活艱苦。

現在轉談我倆夫婦情況。我和伴侶蓉秋第一次見面是在日偽的偵訊室，雖然在這以前我倆已聽到對方的名字和為人，但一直無機會見面。蓉秋早已沒有父親，母親則年邁失明，生活要靠蓉秋維持，租住在一小房間內，不能走動。蓉秋為人很好，面容姣美，善良可親，高擎宇和華貝都曾追求她，但她都沒有接受。

得到釋放回家後，她在她堂叔開辦的一品香中菜館主管賬務，邀請我擔任會計。我欣然接受，以解決生活問題。由此我倆便每天在一起工作，相互瞭解日深，感情日熾，最後，我倆同意結成終生伴侶。1948年2月1日，我們借用一間學校的禮堂，邀請三十多位相熟的友好和同志到來，有些同志(如彭述之、劉家良等)講話祝賀，便算婚禮完成，既沒有茶點招待，更沒有酒席宴客。

從1948年結婚開始，到現在寫成這篇回憶為止，已經70年了，她已103高齡，我也已98歲了。在這悠長的時間裏，我倆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迫害打擊，依然雙雙健在，矢志不移，盡力工作，真的是俗語所祝願的 “白頭偕老”，共度晚年，十分難得。

婚後不久，中共軍隊在江淮等戰役上節節勝利，將橫渡長江，進佔京滬。上海中央鑒於中共緊跟斯大林對托派盡力迫害的政策，深知在中共統治上海後，定遭無情迫害(1952年12月22日實行全國逮捕所有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便是事實證明)，因此，決定遷移至南方。我倆乘輪船先到廣州，然後轉至香港。在航行中，她在船上小產，健康大受影響，因全無藥物及補品調理。她的母親年邁失明，我們經濟拮据，難以帶同南下，只好留滬托她堂弟照顧。

我回到香港後，我胞妹蘊碧仍然留在上海，她在幾年前隻身赴上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當年我家除我外另一人參加托派組織(其餘兩位姐姐和二哥桂歡則只參加外圍團體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蘊碧後來在滬結了婚，丈夫對政治較少興趣，她婚後不幸患了白血病，很難醫治，且經濟能力差，結果病逝。我知道後深感難過。

第六章　第二次被捕和偷渡回港

第一節 被港英警員拘捕後遞解出境

在香港，我白天在外任職，工餘則住在抄寫油印的地方，一起工作的楊同志來自廣西。

有一天，他忘了關房門，給房東闖進，見他在做這種工作。他沒有經驗，驚慌失措，用箱子把所有油印品及工具企圖搬到一位女同志家，但在路上遭警員搜查，並帶到警局盤問及落案，連帶我放工回去時也被捕。由於印製品中有傳單、政治宣傳刊物，被控從事非法政治活動，轉解政治部，被英帝幫辦肆意毆打，逼供組織情況及成員名單，但我堅拒招供，頭面被毆，腫脹得很，連旁邊的華籍“雜差”在我去廁所時也叫我多飲自來水，以消解瘀血。其後送到荷里活道“大館”收監前，當值官見我如此傷勢，不肯即收，要送到瑪麗醫院得到驗傷報告後，才收進域多利監獄，被囚禁了一個多月。

在實行遞解終身出境的當天上午，我還被送到政治部再追問，但仍毫無所獲，再遭英帝特務毒打一輪，然後和小楊一起被遞解落船赴穗。到廣州後，我需要給跌打中醫師診治休養，才逐漸恢復健康。所有這些，都顯示英帝殖民主義者的無法無天，任意殘害中國民眾。

我治好傷痛後，便在李永爵親友開的碾米廠當會計，並住在廠內，以解決生活問題，同時負責廣州組織的工作；蓉秋也隨同我離港來廣州，並在稅務局任職會計。

不久，我去開支部會議返回住所途中，發現有人跟蹤，我於是走入橫街小巷，途中低頭看跟蹤者初時還在跟著，後來不見了。

如果我倆後來不夠警惕和當機立斷，不及時離開廣州赴港，則在次年冬至的全國大逮捕中，必然無可倖免，從而影響了我倆以後大半生的生活和工作。李永爵同志因響應第四國際領

導人巴布洛錯誤地主張返回中國大陸的意見，從香港返回廣州，接任我的碾米廠會計職和黨的工作，從而在不久的冬至夜遭拘禁，再次而且長期地受盡迫害折磨的苦難。

第二節 偷渡回港長期非法居留

1951年，當港英政府實行封鎖中港邊境，只准持有證件者入境的新政策之前一天，我知道不能在中共統治下的廣州長住下去，於是再離開廣州，經過澳門乘船到香港，以後便開始了45年無合法居留證件的非法地下生活。蓉秋也來港，我倆在荃灣芙蓉山腳路邊租了一間小木屋，她到附近的絲綢廠做她的熟練老本行，我無工作，曾一度跟她學師，但難上手，只好作罷。

當時，香港情勢日漸嚴峻，組織方面領導幹部分成 “基礎” 和 “任務” 兩派，各以其對中國政治局勢的評斷和主張的題目末兩字為名，前者為原有本地負責人，後者是來自上海的幹部。歐伯等老一輩則已離港，我來港後，不參加任何一派，而要協調雙方，以免紛爭持續擴大。但爭論仍多少影響了日常的工作。

部份由於我的態度客觀中立，我被他們雙方推選為當時成立的全國臨時委員會書記，直到1978年，才由李西同志接任。

全臨會之成立，是鑒於原有的中央委員劉家良不幸在越南為越共所殺，迫得彭述之夫婦要從越南轉赴歐洲，另兩位中委俞守一和尹寬留在大陸，他們後來都被中共拘禁，在香港的中委只有阮仲琦(黨名焦勵夫)和戴顏(黨名佘獨夫)、劉毅和後補中委鄭鏗。這樣的實際情況使得彭述之倆人認為需要改組中委會成立全臨會，成員除阮仲琦、戴顏、劉毅、丁毅(黨名明明)和鄭鏗外，還加上林斯和我。

早在1949年之前，我們在香港的實際工作，正如前面提到過的，由於接受了托洛茨基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派領袖加農們所總結的該黨被班納姆等人分裂的教訓，支持黨員應到工人中去的主張，動員黨員到工廠環境中工作、學習；因此，香港支部的成員絕大多數於1940年前後都在行動上加以響應，特別多的人是到紡織廠中工作，例如當時設於荃灣名為上海(後改名德豐會)、南海、東南和九龍等紗廠，都曾先後爆發過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 (後來再有反對關廠或搬廠、要求遣散費等)；托派在各廠的成員共有30多人，都積極參加鬥爭，有些更是發動者和領導者。

在此之前托派成員曾領導香港太古船塢工人罷工，並且得到勝利。此事已在前面較詳細地談過。

由托派成員梁蘇為後期副主席所領導的活版印刷工會 (舊名印刷工會，因避免與中共人員領導的印務工會名稱相類似而加上活版二字)，在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於日帝統治之前一年，曾發動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結果得到勝利，每月工資從20元或20多元增加到30元。他們汲取了以前罷工失敗的教訓，非全部工人同時罷工，而採取選擇性的策略(以上是根據梁蘇說的情況)。

1949年聖誕節前，港島電車罷工，托派有4成員積極參加，但無領導它，而是由工聯會屬下的電車工會所領導。罷工失敗，後來檢討認為是由於選擇錯誤的罷工時間，應該等工人領取到年尾雙薪，有經濟力量才罷工。結果爭不到工資增加，在電車工作的工會領導骨幹約30人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香港工人的鬥爭持續了幾年，便逐漸低沉了，這也連帶影響了香港托派同志而導致士氣低落。

在國際上，當時的重要領導人巴布洛主張，中國在海外的同志應回到中國大陸，參加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50多位優秀的同志，包括來自武漢的領導幹部俞守一、廣西來的震炎、徐汝璋、子越、黃斧等都加以響應，但返國後不久，在1952年冬至的全面逮捕中無一倖免。

在這之前數年間，又有許多托派成員純粹因旅遊觀光或探親等原因，先後回到大陸，但全部被國內當局拘捕，不需供出香港托派組織及各成員的情況，而只要他們承諾返港後不再參加組織生活和活動，便把他們釋放回港，他們後

來全都退出香港組織。

中共領導革命的勝利，使得不少同志感到迷惘，懷疑我們的見解主張是否正確，俗語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他們有些人中不無影響。加上其他因素，消極以至退出的人產生骨牌效應。在以上幾方面的影響下，組織的規模日益縮小，對外工作日感困難。

我由於偷渡入境而沒有香港身份證，如果去申領又恐怕翻查檔案知是遞解終身出境“犯”。因此，這個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在供職公司報我的薪俸稅時，我只能設法避免，或用別人名字頂替。而最難防備的是，在街頭遇到警員檢查身份證。有一次，在住處附近遇到警員要查看身份證，我說：“忘了帶出來，我回家取。”他信以為真，讓我走進一座樓宇。我進去後，即往樓下後門走出去，再從遠處看，他已不在等我了。這算是非常僥倖的逃脫；如果被帶回警署，就會被查出，監禁一段時間再遞解出境，且恐怕只有解回大陸，又要落在中共手上：這真是不堪設想的發展。幸而45年來都避過了！由此可反映出我處境的潛在危險。

直至1995年12月，距離香港回歸前不到兩年，在國際特赦協會英國友人的幫助下，我才第一次取得了香港身份證，結束了非法的地下居民的生活，能夠在銀行開立個人戶口，享有投票選區議員、領老人生果金、到公共醫療機構看病等權利。在去申領證件時，那位英國朋友說：真難想像如此長期過著地下的生活。

回顧一生中兩次被捕的壞影響和後遺症：第一次在日帝憲兵指揮下雖受水、電等酷刑的逼供，但獲釋後只在短期有較壞影響；而第二次在英帝殖民地政府的高壓迫害下，影響和後遺症卻是非常長遠的。可堪告慰的是，我兩次都經得考驗，沒有喪失革命者的立場，一切辛勞苦難，都會憑堅強的意志加以克服。

第三節 堅持寫作和出版等工作

1974年初，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了《十月評論》雜誌，後來在刊物註冊處登記成為合法刊物，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以後一段很長時間內幾乎都能維持每月一期。特別是在1989年中國4月學運和民主運動期間，得到讀者的供稿，內容更加充實，當時出版了《四月學運特輯》和《中國民運原始資料專輯》(該專輯有兩集)，圖文並茂，十分精彩，此後再版了幾次，社會上不少刊物都轉載其中一些圖片、大字報、傳單等。這是我們對中國民運的支持和効力的具體工作之一。

《十月評論》除了對中港澳臺等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問題作出評析，提出主張外，更翻譯外國的政治、理論等文章、和第四國際的文件、文獻，以介紹給中文讀者，盡其溝通的橋樑作用。在1996年，曾輯集其中的重要文章、文獻，出版了8本書(總名為《社會主義研究叢書》)，最近又有3本書出版了。

2016年3月出版了《彭述之回憶錄》，這部鉅著涵蓋近現代革命史，資料翔實，由他生前口述，再由他的女兒編撰成中文，我仔細校對及改正，然後出資交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發行。法文本及英文本則由她和法籍丈夫高達樂合作先行出版了。陳碧蘭的回憶錄則早前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再版發行。

《十月評論》獨樹一幟，發出不同的聲音，社會上許多人認為它反映和代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立場。

時移勢易，由於人力、財力的日益減少，《十月評論》每年出版期數，改為三期。儘管如此，至今45年仍始終維持著出版，不致於停刊。一份沒有社會上財政支持的刊物能在中國境內的香港如此長期的出版，可算難能可貴。每當一期出版拿到手上時，內心的欣慰悠然而生，為她付出的辛勞就覺得很值得。我長期以來便是如此在工作中得到快樂。

我在港繼續工作後，寫出了許多文章，主要是對中國問題的評析和主張，最初用小冊子和叢書等形式，以向昇、方興、張開等筆名，以鉛印或油印發表。其後在《十月評論》上，從1974年初創刊號起，幾乎每期都分別用張開、如日、

軍行、振言、微波、涓滴等筆名刊出各類文章。至今大半個世紀，我從未停止過寫作(除了在暫失自由的短時期之外)，猶如我對追求理想的意願從未放棄、停止過一樣。

即使在出版物的技術工作方面，我也努力依從列寧的指示，務求做到盡量少錯漏，每個出版前的校樣，我都細心地校對二、三次，以改正發現到的錯漏之處。

在個人家庭方面，從1953年起6年內，我們生育了一子二女，蓉秋為了照顧三個幼孩，不能再去綢廠工作。我們借了友人幾百元在荃灣石圍角蓋搭了一間木屋居住。她申領了商業登記證，在門外擺放了日常用品、食物等作為零售，主要目的不在謀利以維持一家生活 (因附近只有十多戶人家)，而在於希望以後當局拆遷時可分配到舖位或補償。她一方面買賣貨物，料理家務，非常能幹；另一方面，培育孩子，教導有方。孩子們從幼稚園起便各自上學回家，沒有大人接送，十分獨立。我要到市區工作，為節省交通費和路上時間，我睡在工作地方 (很多時睡在工場或寫字枱上)。我除了日間正職外，還多做兼職和代人報稅，以盡量掙取收入，所得幾乎都交回家用(除了個人生活費外)。當要靠我個人收入維持全家重要開支那幾年間，我的兼職更多，工作更忙。

1967年，我在中環一間公司任職，又在中環半山找到一層舊唐樓，租下來，蓉秋同時把荃灣的木屋賣掉。兒女們相繼成長，考入附近著名的中學，課餘為家庭補習，所得全交作家用。他們勤奮攻讀，學有所成，貢獻於社會，我的孫女和外孫女攻讀了大學。兒孫他們為我們帶來很大的慰藉和期望。

三十多年以來，我的許多親密同志戰友，都非常不幸地先後一一離世了，例如周冀甌、周仁生、姜君羊、李永爵、羅麗萍、章華、謝山、劉毅、明明、陳景光，以及前一輩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等，我時常想念他們；特別是長期努力為《十月評論》大量撰稿和翻譯的同志離世，對出版工作的影響重大，更難以補償。

彭榮老同志黨名李西、張明，他在1978年接任全臨會書記。2004年一天，在同我談話的上午，他有病去看醫生服藥；下午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天橋下面的石欖談話中途，他突然中風，我立即送他到附近的律敦治醫院急救，他後來在病床上醒了，見了我，流出眼淚，自知已難再活下去。後來他出殯時，我雖然想去見他最後一面，但我因病住院，醫生不許我請假趕去送殯，說我很可能因而中風，以致我無法送他最後一程。在這之前，已有劉毅、明明等同志因中風而離世。

我自己有幸，能夠多活至今，惟有盡量保持健康，以便能夠傳承他們的遺願，繼續工作，希望爭取活下去，多做些事情。但我已經年老了，至今已度過97個寒暑。30年前，我陸續患上多種疾病。較難根治的是高血壓、心血管收窄引起的心臟病和支氣管炎引起的咳嗽，一直在看醫生服藥，還算能控制，暫無大問題。只是在開始寫這篇回憶之前不久，我患了肺炎，在醫院捱過了半個月非常痛苦的折磨；返家後休養了一段時間，體力、精神等才漸漸恢復過來。我雖然年紀如此老邁且有大小病患，我仍要努力保持健康，克服困難，爭取活下去，以繼續努力寫作、出版等工作。

我奉獻一生，無愧無疚!

2018年6月30日完稿

Obituary: Comrade Zhang Kai: a Life of Incessant Struggles (1920 - 2018)

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Board

October Review was launched in 1974, and has continuously existed for 45 years. Comrade Zhang Kai,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the editor-in-chief, had tirelessly and single-mindedly worked for 45 years in editing, writing, proofreading, and publication, until he passed away on 4 September 2018. He had raised the flag of Communism all his life even at the fragile age of 99, with very limited resources in hand. One year before, he wrote down his will that *October Review* will continue. The Editorial Board pledges to carry on his legacy.

One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May-Fourth Movement of 1919, Comrade Zhang Kai was born into a peasant family in Zhongsha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e was talented, loved reading, and was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who could enter high school. The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in the Republican era was a time of upheaval. Young people generally opposed imperialist invasion and searched for socialist alternatives. The primary school in which Zhang Kai studied organize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At that time, Zhang Kai was only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He waved a small paper flag in the demonstration and shouted the slogan "Down with the imperialist powers! Down with the warlords!". The middle school which Zhang Kai studied recruited many progressive young intellectuals as staff. The principal graduated from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Huang Jingbo, a teacher who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became a Trotskyist and then came back to his home town. Zhang Kai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teachers. He initiated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bout current affairs, coordinated writings for the noticeboard, joined Zhongshan Youth Wartime Services Group, organized activities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nd served the wounded under Japanese bombing.

It was an era when personal interests we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Passionate young people were everywhere. At the age of 16, Zhang Kai passed an examination with an excellent result to enter Guangdong No.1 High School, the most famous high school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following year, Zhongshan fell into Japanese hands. The school moved to Macau. Despite the hardship in wartime, Zhang Kai could hav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studies like his peers. At that time, Communist Alliance of China, a Trotskyist organization, desperately needed somebody to take up publication work and approached him. Zhang Kai immediately quit his studies and took over the task, and moved to Hong Kong. Days and nights, he worked hard alone in a small room in Mongkok, Kowloon. He did the typesetting layout to print pamphlets calling for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s well as periodicals and internal documents. Meanwhile, he took a course at a leftist news institute at Caine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sland. He practiced self-learning as much as he could. At the age of 20, he formally joined Communist Alliance of China.

In the next eighty years, Zhang Kai remained committed and dedicated to the cause. Same as his Trotskyist comrades, his path was thorny and challenging. Yet, compared with the majority of Trotskyist comrades, Zhang Kai was fortunate as he was not destroyed by persecutions, slanders, suppressions, or killings conducted by the powerful blocs including Japanese imperialists, Kuominta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or British imperialists. After all, Zhang Kai had lived almost one century in which he truly demonstrated how a communist, powerless and suffering from tremendous political oppressions, held on to his faith and led a life of dignity and selflessness. He endured without complaint or regret in all these times of turmoil.

Zhang Kai personally experienced immense physical and mental pain. When he was 22 years old, a workers' strike happened in a silk factory in Shanghai. Three women comrades were arrested, one of whom was an intellectual who could not stand torture and disclosed names and addresses of comrades. Zhang Kai was implicated and was also arrested.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and Chinese secret police tortured Zhang Kai with electric shock, waterboarding, beatings, among others. However, Zhang Kai refused to betray comrades. He was released after three months of detention.

At the age of 30, he was arrested for a second time. This time it was in Hong Kong. He was charged by the British Hong Kong authorities for publishing pamphlet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for organizing illegal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was tortured by British police inspectors and Chinese police from the Political Bureau. Again, he refused to give in. One month later, he was deported for life from Hong Kong to Guangzhou. In 1951, he secretly went back to Hong Kong, and escaped the nation-wide arrest by CPC on Winter Solstice Day of 1952, the day after Stalin's 74th birthday. More than one thousand Trotskyist comrades and sympathizers either died in prison or lost their freedom for up to one-third of a century.

Although Zhang Kai was supposed to have freedom of the person in Hong Kong, he and his family were always under unspeakable mental stress. As illegal resident, there were not only inconveniences in work and life; there was always a risk of being arrested and deported to mainland China which meant being sent to prison as a Trotskyist. The threat was like a sword hanging over the head. Only at the age of 75 in 1995 did he get his identity card, and started a more stable life. Yet, with old age came all kinds of illnesses.

When Zhang Kai was a teenager,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communist cause. Every day since then,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never with regret about his choice. Since he joined Communist Alliance of China at the age of 20, he had continuously worked on research,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In 1948, Communist Alliance of China held the third National Assembly and changed its name to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Zhang Kai was elected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n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1950s, after the nation-wide arrest, Trotskyist comrades in Hong Kong organized an interim national committee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Kai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until 1978 when comrade Li Xi took over. During that period, Zhang Kai wrote a lot of articles and also edited Trotskyist works. In all, he had edited 244 issues of *October Review* and 11 volumes in a series of Studies on Socialism. He also helped with publication of Chen Bilan's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Trotskyist Revolutionary Life - My Memories*, *Memories of Peng Shuzhi*, and 4 volumes of *Collected Writings of Peng Shuzhi*, among others. Two months before he passed away, he finished his autobiographical essay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on his important experiences, but also gave an account of what he knew about history, debates, and propositions of Trotskyists in China.

Zhang Kai was a modest person. He worked laboriously and quietly, not for fame, not for profit, but to advance the communist cause.

Zhang Kai's original name was Liu Gui'an. His pen names included Liu Mang, Kang Jun, Liu Naiguang, Wei Kang, Liu Guang, Xiang Sheng, Fang Xing, Ru Ri, Jun Xing, Zhen Yan, Wei Bo, Juan Di, among other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rises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spurred the outbreak of revolutions in Russia and China. Despite the betrayals of these two revolutions, Zhang Kai deeply believed in the only alternative for humanity: to overthrow capitalism and to build communism with democracy and equality,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Moreover, he deeply believed that from the 1920s to the present, Chinese Trotskyists, despite the slanders, persecutions, and murders by the powerful, had lived for a noble cause. The numerous comrades, including Chen Duxiu, Peng Shuzhi, Chen Bilan, Zheng Chaolin, Wang Fanxi, Yin Kuan, Liu Jialiang, Ji Yunlong, Wang Zhenhua, Li Jieshuang, Li Yongjue, Luo Liping, Jiang Junyang, Liu Pingmei, Zhou Rensheng, Gao Qinyu, Lou Guohua, Zhao Li, Zheng Zekeng, Xie Shan, Xu Kekang, Wang Guolong, Li Xi, Zhang Hua, Chen Wen, Wu Zhongxian, and hundreds gone down in history with or without a name, had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the cause of communism. They were persons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they were honorable souls as communist militants.

When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are fully rehabilitated
We will come to your graves with the consoling words

Comrade Zhang Kai, rest in peace!

13 December 2018

Hong Kong

2 Obituary: Comrade Zhang Kai: a Life of Incessant Struggles (1920 - 2018)
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Board

4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heartless to stab the elderly……Zeming

6 Final report of big debate on land: a sale proposal made by fake popular opinion (reprint).....Roy Ng

8 Hong Kong housing problem is not only problem of land supply (reprint) Lam Chiu Ying

China

9 China's financial open-door policy is surrendering sovereignty under humiliating terms……Pomi

11 Pigs in bad lucks: Asfivirus, local pigs in danger, and the trap of pig raising…..Qingyan

13 The final trial of 709 crackdown: Release Lawyer Wang Quanzhang Immediately (reprint)……..…….Hong Kong groups

14 2019 New Year Declaration: Long journey ahead but never forget (reprint)…….....Marxist Study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15 17th Congress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Analyze, act, build……..Léon Crémieux

18 September 1938 - the foun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Arthur Nicola, Laurent Ripart, Léon Crémieux, Michael Löwy, Penelope Duggan

22 Samir Amin: a vital challenge to dispossession…….....Nick Dearden

25 Agrarian reform is needed to slay apartheid's land demons…….....Aisha Bahadur

27 Maghreb: elements of a debate on the situation…….Nadir Djermoune

29 European Union: A new phase of economic governance?.....Daniel Albarracín

Memory

32 My memories……...Zhang Kai

Article in English

53 Obituary: Comrade Zhang Kai: a Life of Incessant Struggles (1920 - 2018)
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Board

第45卷第2/3期（總第245期）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018年12月30日出版

香港 2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沉痛悼念張開老同志！……十月評論社仝人

4 香港政府涼薄 磨刀捅向長者……則鳴

6 土地大辯論最終報告：一份假借民意的推銷書(轉載)……吳耀駒

8 香港房屋問題不單是土地供應問題(轉載)……林超英

中國 9 中國金融開放即喪權辱國……破謎

11 豬事不順：非洲豬瘟、土豬告急、養豬陷阱……青岩

13 709案最後審判 立即釋放王全璋律師(轉載)……香港團體

14 2019新年獻詞：前路漫漫，莫失莫忘(轉載)……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

國際 15 第四國際第17次會議：分析、行動、建造……列昂・克利繆

18 1938年9月第四國際成立……列昂•克熱繆克斯、亞瑟•尼古拉、 羅仁•里派特邁克爾•羅威、彭尼樓佩•杜甘

22 薩米爾・阿明：一位挑戰掠奪不義的思想家……尼克・迪阿登

25 南非需要用土地改革來處決種族隔離的土地惡魔……阿薩・巴哈杜

27 分析馬格里布地區的現狀……那地・德巨芒

29 歐洲聯盟經濟治理的新階段？……丹尼爾・阿爾巴拉欣

回憶 32 我的簡要經歷回憶……張開

英譯 53 Obituary: Comrade Zhang Kai: a Life of Incessant Struggles (1920 - 2018)
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Board